

劉沅《詩經恒解》初探

陳明義*

一、前言

清代的《詩經》學面貌繁複，大抵而言，清初釋《詩》的學界，仍以雜糅漢宋，斟酌於《詩序》、朱傳之間，而斷以己意的著作為多，如錢澄之（1612~1693）撰《田間詩學》十二卷，「大旨以《小序》首句為主，所採諸儒論說，自注疏、《集傳》以外，凡二程子、張子、歐陽修、蘇轍、王安石、楊時、范祖禹、呂祖謙、陸佃、羅願、謝枋得、嚴粲、輔廣、真德秀、邵忠允、季本、郝敬、黃道周、何楷二十家」，「自稱毛、鄭、孔三家之書，錄者十之二，《集傳》錄者十之三，諸家各本錄者十之四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田間詩學·提要》，卷 16，頁 357）賀貽孫撰《詩觸》四卷，詮《詩》「以《小序》首句為主，而刪其以下之文，以為毛萇、衛宏之附益」、「大旨調停於《小序》、《朱傳》之間，作《詩》之旨多從《序》，《詩》中文句則多從《傳》，〈國風〉多從《序》，〈雅〉、〈頌〉則多從〈傳〉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存目一·詩觸·提要》，卷 17，頁 385）朱鶴齡撰《詩經通義》十二卷，「專主〈小序〉而力駁廢《序》之非，所採諸家，於漢用毛、鄭，唐用孔穎達，宋用歐陽修、蘇轍、呂祖謙、嚴粲，國朝用陳啟源，其釋音，明用陳第，國朝用顧炎武」、「參停於今古之間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經通義·提要》卷 16，頁 358），楊名時撰《詩經剖記》一卷，「大抵以李光地《詩所》為宗，而斟酌於《小序》、《朱傳》之間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經剖記·提要》，卷 16，頁 363）嚴虞惇

* 修平技術學院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

撰《讀詩質疑》三十一卷，「大旨以《小序》為宗，而參以《集傳》，其從《序》者十之七八，從《集傳》者十之二三，亦有二家皆不從，而虞惇自為說者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讀詩質疑·提要》，卷 16，頁 364）范家相撰《詩瀋》二十卷，「大旨斟酌於《小序》、《朱傳》之間，而斷以己意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瀋提要》，頁 367）姜炳璋撰《詩序補義》二十四卷，「以《詩序》首句為國史所傳，如蘇轍之例。但轍於首句下申明之語，竟刪除不論，炳璋則存其原文，與首句中離一字書之，而一一訂其疎舛，例又小殊，蓋用朱子《詩序辨說》之義，以貫通兩家也。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序補義·提要》，頁 368）顧鎮撰《虞東學詩》十二卷，「大旨以講學諸家尊《集傳》，而抑《小序》，博古諸家，又申《小序》，而疑《集傳》，構釁者四五百年，迄無定論，故作是編調停於兩家之說，以解其紛。」、「蓋於漢學、宋學之間，能斟酌以得其平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虞東學詩·提要》，頁 368）此外，如孫承澤撰《詩經朱傳翼》三十卷，「以《小序》、《集傳》並列，而又雜引諸說之異同，窺其大意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存目二·詩經朱傳翼·提要》，卷 18，頁 387），秦松齡撰《毛詩日箋》六卷，「以紫陽《集傳》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，多不依《小序》，因取歐、蘇、王、呂、程、李、輔、嚴諸家，以及明郝敬、何楷，近時顧炎武之言，互相參核，而以己意斷之。不專主《小序》，亦不專主《集傳》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存目二·毛詩日箋·提要》，頁 387~388），閻若璩撰《詩說》一卷，「論《小序》為不可盡信，而朱子以詩說詩，為矯往過正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存目二·毛朱詩說·提要》，頁 392），顧昺撰《詩經序傳合參》，「以《小序》第一句為國史之舊文，次句以下，為後儒之附益，因以朱子《集傳》互核其異同，而斷以己見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·詩類存目二·詩經序傳合參·提要》，同上）除此之外，尚有以朱子為宗，而力攻《小序》者，如姜兆錫的《詩蘊》、王承烈的《復菴詩說》；有以朱子《詩集傳》為主，而兼採眾說的，如康熙欽定的《詩經傳說彙纂》，首列《集傳》，其次兼採漢唐諸儒訓釋與《集傳》合者存之，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為附錄，折衷同異，間出己意，所採漢以下諸儒計有二百六十餘家，如冉觀祖的《詩經詳說》，以《集傳》為主，其後附錄毛鄭及宋元以下諸儒之說，黃夢白、陳曾合撰的《詩經廣大全》二十卷，也以《集傳》為主，而間存諸儒之說。另一方面，在雜糅漢宋、以朱子為宗的釋《詩》專注以外，也有依《序》詮《詩》，攻駁《詩集傳》而專崇古義者，如陳啟源撰《毛詩稽古編》三十卷，《四庫全書總目·毛詩稽古編·提要》謂其「訓詁一準諸《爾雅》，篇義一準諸《小序》，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《毛傳》，而《鄭箋》佐之，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為主。題曰：《毛詩》，明所宗也；曰『稽古編』，明為唐以前專門之學也。所辨正者，惟朱子《集傳》為多，歐陽修《本義》、呂祖謙《讀詩記》次之，嚴粲《詩緝》又次之；所抨擊者，惟劉瑾《詩集傳通釋》為甚，輔廣《詩童子問》次之。……其間堅持漢學，不容一語

之出入」(卷 16, 頁 359) 唯自乾嘉以後,《詩經》漢學漸興,治《詩》著重文字、音韻、名物、制度的研究,在《詩》旨的詮釋、《詩》學的架構、理解上,傾向於宗法《詩序》、毛、鄭,一時著作,如惠棟的《毛詩古義》、戴震的《毛詩補傳》、《毛鄭詩考正》、《杲溪詩經補注》、段玉裁的《詩經小學》、《毛詩故訓傳定本》、胡承珙的《毛詩後箋》、馬瑞辰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、陳奐的《詩毛氏傳疏》等,前後繼出,與清初崇宗漢學,「訓詁一準諸爾雅,篇義一準諸《小序》,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《毛傳》」的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相互輝映,《詩經》漢學於是彬彬大盛。在上述諸家中,除戴震、馬瑞辰在詮《詩》中尚能不拘囿漢宋,對於宋人說《詩》之善者,能擇善而從外,其餘諸家多尊崇漢學,捨棄宋學,因頗有門戶之見。處在尊崇漢學,宋學漸受鄙夷的乾嘉學術氛圍之中,人稱「川西夫子」的四川大儒劉沅(高宗乾隆 33 年,1768~文宗咸豐 5 年,1855)也撰有《詩經恒解》六卷,就此書詮《詩》的蘊向看來,卻未受乾嘉宗法漢學風氣的牢籠,反而展現了其詮衡漢宋,期合乎經義,而斷以己意的獨立治《詩》風格,《清史稿·國史館本傳》謂其「解經盡除門戶之見,不苟異同,務求當於經義,乃至語氣抑揚之間,必悉脗合¹」,證諸《詩經恒解》一書,洵然。從清初以迄乾嘉,就《詩經》詮釋的專著來看,學者較側重在陳啟源的《毛詩稽古篇》、惠周惕的《詩說》、惠棟的《毛詩古義》、戴震的《詩補傳》、《毛鄭詩考正》、《杲溪詩經補注》、胡承珙的《毛詩後箋》、馬瑞辰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,與陳奐的《詩毛氏傳疏》,相關的研究不少²,唯對撰作於嘉慶十年(1805),成書且較《毛詩後箋》、《毛詩傳箋通釋》、《詩毛氏傳疏》都還早,並同屬於乾嘉時期的劉沅的《詩經》專著:《詩經恒解》一書,則缺乏致意,因此,本篇論文擬略就《詩經恒

¹ 見《詩經恒解》(槐軒全書第 11 冊,據西充鮮于氏特園藏影印,1930 年)卷前所附〈國史館本傳〉,頁 2a。

² 舉其要者,如郭明華:《毛詩稽古編研究》(臺北: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,1992 年 5 月)、黃忠慎:惠周惕《詩說析評》(臺北:文史哲出版社,1994 年 1 月)、呂美琪:惠棟《毛詩古義》研究(彰化: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,1994 年 6 月)、岑溢成:《詩補傳與戴震解經方法》(臺北:文津出版社,1992 年 3 月)、張政偉:《戴震、段玉裁、陳奐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論述辨異》(埔里: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,2001 年 6 月)、簡澤峰:《胡承珙毛詩後箋析論》(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系,2001 年 6 月)、劉邦治:《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研究》(臺北: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,1990 年 5 月)、洪文婷:《毛詩傳箋通釋析論》(中壢: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,1992 年 6 月)、邱惠芬:《胡承珙馬瑞辰陳奐三家詩經學研究》(臺北: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,2003 年)、林慶彰:〈陳奐詩毛氏傳疏的訓釋方法〉,《清代經學研究論集》(臺北: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,2002 年 8 月)、黃忠慎:〈清代中葉《毛詩》學三大家解經之歧異一以對〈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〉的依違為考察基點〉,《國文學誌》第六期(2002 年 12 月),頁 91~112、林文華:〈戴震《詩經》研究在清代詩經學上的地位與價值〉,《美和技術學院學報》第二十五卷第一期(2006 年 4 月),頁 13~31 等。

解》的撰作與體例，《詩經恒解》一書的詮《詩》特點與態度，透過劉沅釋《詩》對於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等的論議、更正，劉沅對於朱熹標舉「淫詩」的非議，劉沅對於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的肯定與承用，來呈顯劉沅《詩經恒解》在釋《詩》上，不拘漢宋，無所偏黨，唯以合於《詩》義為要的治《詩》漸向，透過初步的研探，也期能增益吾人對於乾嘉《詩經》學的認識於一、二。

二、《詩經恒解》的撰作與體例

（一）《詩經恒解》的撰作

關於《詩經恒解》的撰作動機與成書時間，據書前《詩經恒解·序》，可以推知一、二：

詩者，聲音之文，本於五性，而毗於陰陽，所感者殊，故其言異，而所言者切，故其反覆流連，不能自己，然達於則者，固不少矣。聖人以為此天地自然之音響，而人心淑慝之明微，爰以器數，用其精微，播之詠歌，布於鄉國，導以天籟之宜，而將其纏綿之致。詩之為教者大，黃炎以來，歌謠不乏，而世遠希傳。文、武周公陶淑天下之人心，範以中和之正道。自朝廟鄉黨以及閨門，莫不有禮樂，即莫不有聲詩，而其陳諸太史，採諸輶軒者，則又所以察民風而行黜陟也。威福可以厲眾，而不能禁輿誦之謳吟；刑政可以偽為，而不能闕民心之美刺，詩與王跡相維，為其下之風俗，上之得失，所由驗也。周衰，禮樂崩壞，風雅淪夷，夫子慮其乖秉彝而失中正，故刪《詩三百》，蔽以無邪，蓋自〈二南〉、〈豳〉、〈雅〉而外，其詩皆不過當時之詞，而自子釐訂，則無往非聖人之教也。歷代諸儒發明傳註，不為無功，然其不達聖人之意，流為世俗之譚者，抑又夥矣。夫風雅之文，通乎天地，而哀樂之過，失為淫哇，不有以正之，則詩之道日博，而詩之義遂亡。愚故不辭冒昧，集眾說而折衷焉。凡所疑信，一以聖人為依，非敢謂毫髮無遺，聊以補前人所未備。名曰《恒解》，亦以人心之公理，非有所穿鑿矯勉為云。嘉慶十年，歲在乙丑仲春，廣都劉沅識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前，頁 1a～2a）

據此，劉沅以為詩有深廣的政教功能，既有「陶淑天下之人心，範以中和之正道」的效用，也有「察民風而行黜陟」的意義。但周衰、禮樂崩壞之後，上述功能式微，孔子因而繼起，「刪《詩三百》，蔽以無邪」，重新釐訂詩篇，並賦以深遠的政教功能與意涵。《詩三百》既有深遠的政教功能與意涵，所謂聖人之教，但歷代諸儒詮解《詩經》，發明傳註，雖不為無功，但不

能了解、掌握聖人藉《詩》垂教之意，因而流於世俗之譚者更多，劉沅因而參稽眾說，在眾說的基礎上，來辨析、折衷、探究聖人藉詩垂教之義，以補前儒釋《詩》的未備。可見，《詩經恒解》之所以撰作，乃是劉沅以為歷來詮《詩》諸儒並不能真正究探、掘發聖人藉《詩》垂教之義。關於劉沅因不愜諸儒詮《詩》不能究探、掘發聖人藉《詩》垂教之義，因而撰作《詩經恒解》一書，庶以補前儒之未備，此種論點，在《詩經恒解·凡例》中，也有傳達出來：

〈大序〉、〈小序〉本一，朱子分「詩者，志之所之也」至「詩之至也」止為〈大序〉，自「〈關雎〉，后妃之德」至「〈關雎〉之義也」為〈小序〉。毛公、鄭康成、梁昭明輩，謂為子夏作。至程子竟謂〈大序〉文似〈繫辭〉，其義非子夏所能言，則推尊太過。程大昌謂為衛宏作。今按：其詞義純雜不一，大抵源於子夏，而後儒增益之，即〈大序〉亦非盡子夏之言也。至〈小序〉，則多失詩意，今取其合聖人之義者存之，他不盡錄。（《詩經恒解·凡例》頁 1b~2a）。

《詩》註自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、《孔疏》而外，莫著於朱子之《集傳》，其他傳解，《四庫全書》所收已一百四十餘家，各有發明，義不盡允。今取其不謬聖人者，其他辨說，不能悉舉。學者細玩本註，自得諸家是是非，免滋訟矣。（同上，頁 3b~4a）

據上列二條文字，劉沅以為〈詩序〉詞義純雜不一，又〈小序〉解《詩》，多失《詩》意；另一方面，就歷代詮說《詩經》眾多的專著看來，雖各有發明，但就符合《詩》義、聖人之義的標準來看，其論說仍不甚允當。綜上，可見劉沅所以撰作《詩經恒解》，其動機厥在對於歷代詮解《詩經》專著的不愜，以為雖各有發明，但不能盡達聖人藉詩垂教之義，劉沅因而撰作《詩經恒解》六卷，以補前儒釋《詩》的不備。至於《詩經恒解》的成書時間，據《詩經恒解·序》末「嘉慶十年，歲在乙丑仲春，廣都劉沅識」（卷前，頁 2a）云，可見《詩經恒解》成書於嘉慶十年（1805）仲春，沅時年三十八。

（二）體例

《詩經恒解》全書六卷，卷一、卷二為〈國風〉部份。卷一自〈周南〉至〈王風〉（即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、〈邶風〉、〈鄘風〉、〈衛風〉、〈王風〉），卷二自〈鄭風〉至〈豳風〉（即〈鄭風〉、〈齊風〉、〈魏風〉、〈唐風〉、〈秦風〉、〈陳風〉、〈檜風〉、〈曹風〉、〈豳風〉）卷三、卷四為〈小雅〉部份，卷三，自〈鹿鳴之什〉至〈祈父之什〉（即〈鹿鳴之什〉、〈白華之什〉、〈彤弓

之什》、〈祈父之什〉），卷四自〈小旻之什〉至〈都人士之什〉（即〈小旻之什〉、〈北山之什〉、〈桑扈之什〉、〈都人士之什〉）。卷五為〈大雅〉部份，涵括〈文王之什〉、〈生民之什〉、〈蕩之什〉，卷六為〈頌〉的部份，涵括〈周頌・清廟之什〉、〈臣工之什〉、〈閔予小子之什〉、〈魯頌〉、〈商頌〉。形式上，在十五〈國風〉、二〈雅〉、三〈頌〉的卷首，都有一段說解的文字，分就國風、十五國風、雅、大、小雅、《頌》、〈周頌〉、〈魯頌〉、〈商頌〉的名義、內涵等相關問題，略作說解，兼辯前儒說《詩》之非，然後再依《詩》之篇次，逐一詮解。就各《詩》訓解的形式來看，《詩經恒解》六卷，全文照錄《詩經》三百零五篇的詩文，並依章次，先標《詩》之作法，然後隨文訓釋，先釋字義、詞義、名物等訓詁，再分釋各章的章旨，至於全詩的詩旨，則奠於篇末。此外，在篇末又往往有「附解」一欄，針對《詩》旨的闡明、前儒釋《詩》之非、不諦等相關問題，再作進一步的博辯肆議、糾謬訂正，而在各《詩》的上端，並有針對《詩》的作法、遣詞用字等，作相關的評點，全書訓解的體例、形式，大抵如上所述。茲舉例說明如下。卷一卷首，在詮解〈關雎〉一詩之前，有「國風一」與「周南一之一」，謂：

諸侯之國，民俗歌謠曰風。謂其感於上而為風俗，其言又足感人如風也。先王采之列國，以考其政俗，而行乎勸懲。周衰，王政不行，諸侯悖亂，夫子乃推明先王政化之意，又約取列國歌謠，刪存如左，而此卷則〈國風〉之第一篇。（頁 1a）

古公亶父遷岐居周原，因號國曰周，而文王因之。既而遷豐，曾分令周、召二公巡行岐周之地，以宣教化。其後武王有天下，國仍號周。周公相成王，作禮樂，采文王時風謠，以其所作之地，分繫二公，別之曰：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。南，國名，其地皆古南國地。（同上）

前條說解〈國風〉的名義、先王搜採列國國風的作用，與周衰之後，孔子約取刪存列國歌謠的意義；後條則說解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的命名、時代與地域等問題，之後，則照錄〈關雎〉一詩全文，並標示作法，先依字義、詞義、名物等方面作訓詁，再分釋一章之旨謂：

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興而比也。關關，雌雄和應之聲。雎鳩，王雎，常在水中食魚，其居各有界域，非其配者，聞聲則鬪，故《毛傳》曰「摯而有別」。窈窕，幽靜之意。淑、好，皆善也。逑，匹也。河，北方水流之通名。洲，水中地。淑女，后妃姒氏。君子，文王也。言關關之雎鳩，其性鷺烈，不妄配偶，在河之洲，可望而不可即，此窈窕之淑女，德性貞閒，不可以非禮干，誠君子之佳耦也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，寤寐求之。求之不得，寤寐思服。悠哉悠哉，輾轉反側。興也。荇，接余也。其根可食，故曰菜。服，事。悠，長。輾轉反側，臥不安席。承上言，非淑女無以配君子，而求之不易，蓋一毫非禮，淑女不就也。彼荇菜止在水中，而左右流之，不能遽獲；淑女宛在目前，而寤寐德懷思，不可苟求。蓋六禮之事，稍有不備，皆為所拒，且淑女必擇賢夫，雖以文王之聖，其始尚徘徊審慎而不遽許字也。〈大雅〉曰：「在洽之陽，在渭之涘。」此河洲荇菜，所以即事興言也。

參差荇菜，左右采古音泚之。窈窕淑女，琴瑟友古音以之。參差荇菜，左右芣之。窈窕淑女，鐘鼓樂五教反之。興而比也。采，慎而擇之。芣，熟而薦之。友以德相親，樂以善相好。承上言，淑女求當以禮，彼參差之荇菜，必左右慎擇而取；此窈窕之淑女，當琴瑟中正而諧。迄乎既得，則君子正位乎外，淑女正位乎內，上承宗廟，下育兆人，其道備矣。故參差之荇菜，珍重而熟，以薦於神明，此窈窕之淑女，愛敬而好合，成家，鐘鼓樂之，如鐘與鼓之相需而和以此相好中合之意。既溢於家庭，而聲聞遂暨於四國矣。

（卷1，頁1a~2a）

「興而比也」是標示〈關雎〉首章的作法，自「關關，雌雄和應之聲。」以下，至「君子，文王也。」是就〈關雎〉首章的字義、詞義與名物等方面所作的訓釋。而「言關關之雎鳩，其性鷺烈，……誠君子之佳耦也。」則是就〈關雎〉首章的章旨所作的詮解。此外，〈關雎〉二章下云「興也。」是標示此章的作法，自「荇，接余也。其根可食，故曰菜。」至「輾轉反側，臥不安息。」是就〈關雎〉二章字義、詞義、名物所作的訓釋。而「承上言，非淑女無以配君子……所以即事興言也。」則是就〈關雎〉二章章旨所作的詮解。而〈關雎〉三章下云：「興而比也。」也是標示此章的作法，自「采，慎而擇之。」以下，至「友以德相親，樂以善相好。」也是就字義、詞義、名物所作的訓釋，而「承上言，淑女求當以禮，……既溢於家庭，而聲聞遂暨於四國矣。」則是就三章章旨的作的詮釋。至於篇末，則是詩旨的點明與申說，謂：

文王得聖女妣氏以為妃，宮人喜之，而作此詩。○蓋夫婦人倫之本，萬化之原，聖帝明王，正身齊家，此為先務。妣氏擇有德而後字，文王擇有德以為妃，此周家王業之基也。宮人先美其匹偶之宜，而追敘其未得之思，乃詳其已得之樂。蓋自太王、王季，至於文王，化洽閨門，宮人亦知大義如此，故其詞義皆惓惓於慕德，而不及乎私昵。周公制作，以此為房中之樂，而用之鄉國天下，孔子曰：「樂而不淫，哀而不傷」，

蓋中正和平，莫逾於此也。

（同上，頁 2a~2b）

「文王得聖女妣氏以為妃，宮人喜之，而作此詩。」是〈關雎〉一詩詩旨的點明，而「蓋夫婦人倫之本」以下至「莫逾於此。」則是就詩旨所續作的申說、闡論。除此之外，篇末又有「附解」一欄，針對二南的分別、前儒的說解之誤，及詩人以「關關雎鳩」取興之義等相關問題，續作博辯肆議、糾謬提正，云：

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或以為分陝之後，以詩繫之，或以文王分二公采邑。然文固紂臣，事以小心，必不以宋地私其子，分陝之說，出於《公羊》，在武王得天下後。且陝為漢宏農，其地居二京之中，〈二南〉之詩與地多不相合。愚以為商時岐豐荒遠，其地半淪於夷，太王遷岐，已是拔山通道，王季德化漸闢，戎狄歸心，故殷命為西伯，以統諸戎。至文王而德政日新，諸侯益附，故命周、召二公巡行安輯，以宣政治，暨後周公制作，以當日之風謠，核諸地理、分南隸之，亦不過簡編彙敘，非公自敘其績，竝召公而誇載之也。後人溯王治之所由隆，則本諸二公，以見其烈，當日不然，夫子因之，亦無深意，而《序》云「〈周南〉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〈召南〉，諸侯之風，故繫之召公。」夫諸侯之風，皆天子之風也，而文王時紂為天子，文一諸侯，〈二南〉所詠皆文德所漸被，其大權固猶是紂秉也，文豈改制而更為哉？即周公以〈二南〉為化，始亦祇謂文考，修身、齊家、王業所基，曷嘗於〈二南〉或分優劣。至雎鳩，俗名魚鳩，其居水次，各分界限，不相陵越，如或犯界，必死鬪不休，羅者為其聲以致之即至。配偶不亂，以聲相和，如君子之夫婦，敬而有別，故特取興關關，所居有定，如正內正外之義，故取興於在河之洲。琴瑟和平靜正，喻夫婦以德相悅，不徒情昵。鐘鼓和鳴，聲大而遠，喻夫婦諧和，家道修而教化遠。蓋詩人取義至為深遠，舊說太覺囿圖。又《詩傳》疑義甚多，今直據本文解之，諸家聚訟，不能悉辨，後皆放此。

（同上，頁 2a~3b）

據此，附解一欄中，針對前儒所謂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是「分陝之後，以詩繫之」、「文王分二公采邑」及〈詩大序〉「〈周南〉，王者之風，故繫之周公；〈召南〉諸侯之風，故繫之召公。」之說，提出非議，並就〈關雎〉一詩取興之義，詳加探說。而在各詩篇端，又有針對詩的章句、作法、意涵所作的評點之文，如〈關雎〉首章上端：

首二句咏歎雎鳩之間肅，不可妄干己，將后妃全身寫出，只以窈窕二字一點，而歎其為君子好逑，筆意深妙至矣。

（同上，頁 1a）

〈關雎〉二、三章上端：

二、三章只就苕菜比義，初焉，求之切而不得其道，繼焉，順其道而求之，乃得。于是以薦于神明，化于天下，許多意義，一二字括之，而反復抑揚，亦復無極。

（同上，頁 1b～2a）

而《詩經恒解》在各詩篇端所以綴有評點之文，是因劉沅以為「《詩》之義類，經夫子刪定，博大精深，固不待言，而文法之妙，音節之高，亦萬非後世所能彷彿」，因此在詮解《詩》旨之餘，「竝於簡端，贅以評語」，目的則是「欲人涵泳義理，得其性情，庶有益於身心，而不徒為文字之助也。」（以上俱見《詩經恒解》卷首〈凡例〉，頁 3b）

三、《詩經恒解》詮《詩》的特點

（一）《詩經恒解》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等詮《詩》的論議

《詩經恒解》的撰作，源於劉沅對於歷代詮《詩》專著的不愜，以為諸儒詮《詩》，雖各有發明，但對於《詩》義的理解，及聖人（孔子）刪《詩》垂教的寓義方面，都有所欠缺、不當，因此，就《詩經恒解》全書看來，對於前儒釋《詩》的非議、修正或不取，即成為此書詮《詩》的特點，茲先就《詩經恒解》論議、修正《詩序》、朱熹等的詮《詩》之處，舉例說明如下：

1. 〈召南·草蟲〉

〈草蟲〉一詩的詩旨，《詩序》以為是「大夫妻以禮自防也³。」朱熹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謂：「此恐亦是夫人之詩，而未見以禮自防之意⁴。」在《詩集傳》中詮釋此詩，因謂：「南國被文王之化，諸侯大夫行役在外，其妻獨居，感時物之變而思君子如此。亦若〈周南〉之〈卷

³ 見〔漢〕毛亨傳、鄭玄箋、〔唐〕孔穎達等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毛詩正義》（臺北：台灣古籍出版公司，2001年10月），卷1之4，頁82，凡以下本篇論文所徵引之《毛詩正義》，皆據此本。

⁴ 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序辨說》，收入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之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第壹冊，頁359。凡本篇論文以下所徵引的《詩序辨說》，俱依此本。

耳」也⁵。」劉沅詮解〈草蟲〉，與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不同，謂：

南國被文王之化，諸侯夫人相其君以禮，憂不得賢而作。○亦如〈周南〉之有〈卷耳〉也，《序》與舊說，皆失其指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13b）

在〈附解〉中，並論議《序》、朱之非：

《序》曰：「大夫妻」，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，其說可笑，黃氏樵非之，是矣。而以為大夫妻憂念其夫，不敢怨上，謂以禮自防，亦屬牽強。若但以為大夫行役，其妻思之而已，又無以見文王之化，是皆不得詩人立言之意而妄揣者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14b）

據上，可見劉沅以為〈草蟲〉是諸侯夫人佐助其夫以禮，憂慮不能得到賢人相輔治國之詩。對於《詩序》「大夫妻」、說者以為「未嫁之女」、黃樵以為「大夫妻憂念其夫，不敢怨上」是「以禮自防」之意⁶，及朱熹「大夫行役在外，其妻獨居，感時物之變而思君子如此。」諸說，劉沅皆以為未得詩人立言之意，均屬妄加揣摩之說，謂其為非、為牽強、無以見文王之化。

2. 〈邶風·雄雉〉

《詩序》謂：「刺衛宣公也。淫亂不恤國事，軍旅數起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而作是詩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二，頁159）以為是譏刺衛宣公之詩。由於宣公上烝庶母夷姜，下奪太子伋之婦宣姜，淫亂悖倫，又屢屢有興動軍旅之事，導致大夫之役，男曠女怨，所以國人作〈雄雉〉一詩來譏刺他。朱熹則謂：「《序》所謂『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』者得之，但未有以見其為宣公之時，與『淫亂不恤國事』之意耳。兼此詩亦婦人作，非國人之所為也。」（《詩序辨說》頁363）對於《詩序》所說，除取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」之外，餘皆不取，並以為〈雄雉〉是婦人思念久役在外的丈夫之詩，在《詩集傳》中云：「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，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，而我之所思者，乃從役於外，而自遭阻隔也。」（卷二，頁

⁵ 見〔宋〕朱熹：《詩集傳》，收入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之《朱子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；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12月）第壹冊，卷一，頁413。凡本篇論文以下所徵引的《詩集傳》，俱依此本。

⁶ 黃樵之說，見〔宋〕黃樵、李樗：《毛詩李黃集解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3年）卷三：「《序》曰：『大夫妻』，而說者以為未嫁之女，已失其旨矣。」……或曰：所以禮自防者，安在？曰：『以禮自防』非謂懼為淫風所染，而以禮制之也。人情思極則易至於怨，怨極則易至於叛。〈召南〉之「大夫妻」，雖憂念其大夫而不敢怨其上，此無他，畏文王之禮義而不敢為非，而以禮自防爾。」（頁12a～13b）

429) 劉沅詮解〈雄雉〉，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之說也有所論議及修正，云：

《序》說以為「刺衛宣公」，毛氏曰：「不恤國事，大夫久役，男女怨曠，國人患之而作」，意蓋云此詩之作，作於此時，其故由於宣公不道，未為大失也。而鄭康成黏滯宣公，遂多謬解。朱《傳》定為「大夫妻思其君子」，當矣，而於語義猶不盡協，今就本文詰之，庶字字皆有著落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34b）

劉沅以為《詩序》所謂「刺衛宣公」、詩作於衛宣公之時云云，乃是因為宣公不道而歸之，但此說尚未為大失，唯鄭玄據《序》詮《詩》，遂將《詩》文黏滯、比類於宣公，故頗多謬解⁷。而朱熹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定〈雄雉〉是「大夫妻思其君子」之詩，劉沅認為此說「當矣」，但在詮說及詩義之間仍有不盡相合之處，劉沅遂定〈雄雉〉一詩的詩旨為：

賢婦勸其夫出仕，不能行其道，婦悔恨自咎而作。○其夫不遇伏處，妻勸之仕，以為可以有益于國，有益于民，既而不然，故作此自咎。夫子錄之，以教後世百爾伎求之時，不可輕身枉道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34a~34b）

並詮釋〈雄雉〉四章之意云：

興也。雉，野雞。雄者有冠。雉文明而耿介，喻君子也。泄泄，從容貌。詒，遺。阻，隔也。自詒伊阻，言其夫不仕，行止從容自如，已勸之出仕，意欲效忠盡力，有益于國，不料今日致丈夫進退兩難，已亦憂勞，是自詒其戚也。

（一章）

比也。展，誠。雉飛而下上其音，喻事上接下，委曲相就，不能行其直道，實難以立朝。一時又不能退休，已思君子之意，甚憂勞也。

（二章）

比也。悠悠，思之長。日月往來，君子去之而難返，言其夫既已委贄，不能即退，如行道者去遠，一時難以言旋，深自咎勸夫出仕之非也。

（三章）

賦也。百爾君子，指同列者，此乃言已悔恨之故。夫之不容于朝，以百爾君子，不知德行，有事難了，責求其夫，無事平日，則忘其夫之才，以至丈夫下上其音，幾乎不能自保也。

（以上並見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33a~34b）

⁷ 〈雄雉〉一章：「雄雉于飛，泄泄其羽。」鄭玄云：「興者，喻宣公整其衣服而起，奮訊其形貌，志在婦人而已，不恤國之政事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二，頁 160），同注 3。

可見劉沅以為〈雄雉〉是賢婦勸其丈夫出仕，以為可以有益於國，有益於民，但結果卻是陷丈夫於進退兩難、不能自保之境，婦人遂深自悔恨自咎，因作〈雄雉〉一詩。〈雄雉〉各章，劉沅的詮解，皆扣緊賢婦勸夫出仕，不得其道，因深自咎恨之意，這樣的詮說，與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之說，都有了差別及修正。

3. 〈鄘風·柏舟〉

〈柏舟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共姜自誓也。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守義，父母欲奪而嫁之，誓而弗許，故作是詩以絕之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一，頁212）以為是衛國世子共伯之妻共姜自誓不願更嫁的詩。由於共伯早死，其妻守義不嫁，但其父母卻要逼使她改嫁，因此共姜遂作〈柏舟〉一詩，向父母表露誓不改嫁之心志，以斷阻父母欲逼其改嫁的念頭⁸。朱熹釋〈柏舟〉，以為「此事無所見於他書，《序》者或有所傳，遂「姑從」（《詩序辨說》頁364）《詩序》之說，在《詩集傳》中詮解〈柏舟〉亦謂：「舊說以為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共姜守義，父母欲奪而嫁之，故共姜作此以自誓。」（卷三，頁441），劉沅對於《詩序》及朱熹之說，亦有論議：

此詩《序》及諸儒皆以為共姜守義而作，無異詞。顧《史記》載衛釐侯卒，子共伯餘立，弟和以賂賂士，襲共伯於墓上，共伯入釐侯羨自殺，和立，是為武公。呂祖謙曰：「武公在位五十五年，《國語》稱武公年九十有五，猶箴戒於國，計其即位已四十餘矣。使共伯果見弑，則其年又長於武公，安得謂之早死？髦者，子事父之節，諸侯既小斂，則脫之，《史記》謂釐侯已葬，而共伯自殺，則是共伯已脫髦矣，詩安得猶謂之「髦彼兩髦」，是共伯無見殺之事，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。」愚按：此說甚明。武公〈抑抑〉、〈賓延〉、〈淇澳〉諸詩，備詳其德，時稱為睿聖武公，安有睿聖而篡弑者。《孔疏》謂「以其未成君，故云兩髦，繫之以父在之詞」蓋信史而不信經，多見其惑之甚矣。史遷不足信者甚夥，當分別觀之，此尤大義所關，決不可信，故且泛作守貞者為是，蓋衛淫亂所不屑言，夫子既彰其事以戒惡，而又錄〈靜女〉及此詩，以見宮闈草野皆有賢媛，不然，人道幾滅，衛何以能復興也。或謂共伯即非被弑，亦或早卒，然世子之妻亦無母氏便可奪志改嫁之理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46a~47b）

⁸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柏舟·序〉：「作〈柏舟〉詩者，言其共姜自誓也。所以自誓者，衛世子共伯蚤死，其妻共姜守義不嫁，其父母欲奪其意而嫁之，故與父母誓而不許更嫁，故作是〈柏舟〉之詩，以絕止父母奪己之意。」，卷三之一，頁212，同注3。

劉沅對於《詩序》所謂衛國世子共伯早死之說，參核《史記·衛康叔世家》所載「四十二年，釐侯卒，太子共伯餘立為君，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，多予之賂。和以其賂賂士，以襲攻共伯於墓上，共伯入釐侯羨自殺。衛人因葬之釐侯旁，諡曰共伯，而立和為衛侯，是為武公⁹。」又援引呂祖謙的駁議：其一，武公在位五十五年，據《國語·楚語》所說，武公年九十五，猶箴戒於國，由此推估，武公即位時也已四十餘歲，如果共伯果真見弑，而他的年齡又長於武公，那麼，共伯之死，即不能謂之早死，其二，所謂「髦」是子事父之飾，諸侯若小斂之後，則脫去，根據《史記》的記載，共伯自殺於釐侯已葬之後，那麼，可見共伯已脫髦了，但《詩》文卻仍稱其「髦彼兩髦」，可見共伯並沒有自殺，而武公也不曾有篡弑之惡¹⁰，以為呂說分明。劉沅並指出，據〈大雅·抑〉、〈小雅·賓之初筵〉、〈衛風·淇奥〉諸詩，都詳述了武公之德，武公尚時還被稱為睿聖武公，既稱睿聖，何來有篡弑之舉？《毛詩正義》謂共伯「以其未成君，故云兩髦，繫之以父在之詞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一，頁212），這是信史而不信經；劉沅以為〈柏舟〉一詩，應泛作女子守貞之詩為是，他認為孔子存錄〈邶風·靜女〉及〈鄘風·柏舟〉，其用意是在既已存錄〈鄘風·桑中〉，以彰顯衛國淫風而寄寓戒惡之意後，孔子也有意藉著〈靜女〉、〈柏舟〉二詩，來說明衛國無論在宮闈之中或在民間，也都還有賢媛貞女的存在，否則人道幾滅，何來日後衛國的復興，另一方面，有人指稱共伯即使並非被弑，但也有可能早死，劉沅指出，即使這樣，也沒有母氏便可逼迫世子之妻改嫁之理，綜上，劉沅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逕以衛世子共姜自誓之詩詮解〈柏舟〉，皆不取，僅泛解為：「衛有子成婚而卒，其妻守義，因欲奪其志而嫁之者，其女作此詩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46a）

4. 〈鄘風·蝮蝥〉

〈蝮蝥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止奔也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恥，國人不齒也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二，頁241）以〈蝮蝥〉是止息淫奔之風之詩。由於衛文公能以德化感化人民，使人民皆知禮法，並以淫奔者為恥，因此，若有人有淫奔之恥的，國人皆會對他嫌惡，不屑和他同列，既如此，淫奔之風自然歇止¹¹。朱熹詮解〈蝮蝥〉，在《詩序辨說》中謂：

⁹ 見〔日〕瀧川龜太郎：《史記會注考證》（臺北：洪氏出版社，1986年9月），卷37，頁601。

¹⁰ 呂祖謙之說見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3年），卷五，頁2b～3a。

¹¹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蝮蝥·序〉云：「作〈蝮蝥〉詩者，言能止當時之淫奔。衛文公以道化其民，使臣皆知禮法，以淫奔者為恥。其有淫之恥者，國人皆能惡之，不與之為齒列相長稚，故人皆恥之而自止也。」（卷三之二，頁241）同注3。

〈定之方中〉一篇，經文明白，故《序》得以不誤。〈蝃蝀〉以下（〈按：指〈蝃蝀〉、〈相鼠〉、〈干旄〉）〈蝃蝀〉以下，亦因其在此而以為文公之詩耳。他未有考也。

（頁 366）

對於〈蝃蝀·序〉將〈蝃蝀〉歸為衛文公之詩，朱熹以為作〈序〉者因〈蝃蝀〉編次在〈定之方中〉以下，遂歸諸衛文公時詩，其實《序》說並不真正可信，但對於〈蝃蝀·序〉「止奔」之說，朱熹則酌以採用，在《詩集傳》中詮解〈蝃蝀〉，遂謂：

此刺淫奔之詩。言蝃蝀在東，而人不取指，以比淫奔之惡，人不可道。況女子有行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，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？（卷三，頁 446）

劉沅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之說，也有論議：

《序》說「止奔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恥，國人不齒。鄭、孔皆從之。然以其說，求諸本文，語氣多不貼切，如「莫之敢指」，何所謂而不敢？「遠父母兄弟」，鄭《箋》曰：「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，何憂不嫁，而為淫奔之道乎？」朱《傳》曰：「淫奔之惡，人不可道，況女子有行，又當遠其父母兄弟，豈可不顧此而冒行乎？」語皆牽強。如或之說，則以南子託兄弟而召宋朝，靈公為其所愚，國人莫敢顯言，故曰「莫敢指，遠兄弟父母也」，而末節「懷昏姻也」，乃直揭其事以刺之也，不得以其無稽而沒之，況「乃如之人」，明明有所指目，若作泛刺淫奔，神味索然。試涵泳正文自見。人道即天命，守信即為安命，詩人之言及此，蓋賢者之詞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53b～54a）

據此，劉沅以為《詩序》「止奔也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，淫奔之恥，國人不齒。」之說，鄭玄、孔穎達俱遵從，但《詩序》之說，按核詩文，並不貼切，如《詩》「莫之敢指」一句，究竟是何所指涉而謂不敢？而「遠父母兄弟」，鄭《箋》及朱《傳》的詮解，俱屬牽強。因此，劉沅以為〈蝃蝀〉一詩的詩旨應是：「或曰：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，國人譏之也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53a）據《左傳》定公十四年所載，衛靈公嘗為夫人南子召宋朝，杜預注：「南子，宋女也。朝，宋公子，舊通于南子，在宋呼之¹²。」換言之，劉沅以為〈蝃蝀〉一詩，即

¹² 〔周〕左丘明、〔晉〕杜預注、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，李學勤主編：《春秋左傳正義》（臺北：台灣古籍出版公司，2001 年 10 月），卷五十六，頁 1846。

是詩人譏刺靈公夫人舊嘗與宋朝有染，但靈公不知，竟還為其召宋朝之詩。劉沅以為《詩》文「莫之敢指」、「遠父母兄弟」，即是南子假託兄弟而召宋朝，靈公不知他倆舊有的關係，竟應允之，而為其所愚，國人欲譏刺南子，但不敢明言，所以才說「莫之敢指」，而南子是從宋國嫁至衛國，故曰「遠父母兄弟」。另一方面，《詩》文在三章有「懷昏姻也」一句，即是詩人直揭其事來譏刺南子。且《詩》文之中既有「乃如之人也」一句，即是確有指涉其人，如果僅以刺淫奔，作泛泛之說，劉沅以為如此便索然無味。因此，劉沅在實際的解《詩》中，即從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，國人譏之也的關係來詮解，如釋〈蝦蟆〉一章：「蝦蟆在東，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，遠父母兄弟。」云：

比而賦也。蝦蟆，虹也。陰陽不正之氣，交而為虹，在東，暮虹也。莫之敢指，以比南子淫亂，不敢斥言，因言女子出嫁，則已遠父母兄弟而來矣，何反召宋朝乎？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53a）

釋二章：「朝濟于西，崇朝其雨。女子有行，遠兄弟父母。」云：

比而賦也。濟，升也。虹亦日濟。虹映日氣而成，故朝西暮東，言朝陽初出，虹已自西而升，喻陰邪之氣，惑亂君心，崇朝其雨，陰氣隨之而盛也。（同上，頁 53a～53b）

釋三章：「乃如之人也，懷昏姻也，大無信也，不知命也。」云：

賦也。人，指南子。靈公為夫人召宋朝，謂其公族為兄弟，固不知其私懷。詩人言此人託召兄弟，實懷昏姻之欲也。女子守身曰貞，信，且以其欺靈公而言，故曰無信。命，天理，言其背人道而逆天理，無所畏忌，深惡之而深歎之也。（同上，頁 53b）

劉沅釋〈蝦蟆〉坐實南子召宋朝，靈公為其所愚，國人作詩以譏刺南子，與《詩序》泛作「止奔」、朱《傳》泛作「刺淫奔」之詩，顯然有所差異。

5. 〈王風·采葛〉

〈采葛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懼讒也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一，頁 313）鄭玄箋釋《詩序》之意云：「桓王之時，政事不明，臣無大小，使出者則為讒人所毀，故懼之。」（同上）據此，《詩序》以為〈采葛〉是桓王諸臣憂懼讒言之詩。朱熹詮釋〈采葛〉，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而謂：

此淫奔之詩。其篇與〈大車〉相屬，其事與「采唐」、「采葑」、「采芣」相似；其詞與

鄭〈子衿〉正同，《序》說誤矣！

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69）

采葛所以為絺綌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。故因以指其人，而言思念之深，未久而似久也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四，頁 467）

視〈采葛〉為淫奔之詩。其理由有三，其一，〈采葛〉一詩在篇次上與〈大車〉相連屬，其二，〈采葛〉一詩的內容與〈鄘風·桑中〉篇中所寫的「采唐」、「采葑」、「采麥」相似，其三，〈采葛〉中的詞句：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與〈鄭風·子衿〉的詞句正同，〈大車〉、〈桑中〉、〈子衿〉三詩既都是淫奔之詩¹³，則〈采葛〉也自應為淫詩，如此，《詩序》的詮說顯然是錯誤的。劉沅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之說，也有論議：

《序》說「懼讒也」，毛、鄭、孔《疏》皆云使臣任事於外，讒閒易生，一日不見君，則如三月，諸儒多從之。然以彼屬使臣，下文接意殊強，朱子定為淫奔託言，而本文詞氣和順，亦未有以見其為淫詩也。或謂賢者被讒，見黜於野，周人閔之而作，近是。蓋采葛、蕭、艾，細人之事，言以彼之賢而竟采艾兮，令人思念不能已，雖一日不見，亦如三歲兮，凡《詩》用兮字，皆有餘情之詞，蓋不顯斥其君棄賢之非，而第言其所事非事，已難忍然，其為歎息無窮，而其用意為至溫厚矣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77b～78a）

劉沅以為《詩序》「懼讒」之說，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、《孔疏》皆就使臣任事於外，憂懼讒言遂生於內，因此，一日不見國君，就有如三月之久來詮說，劉沅以為以《詩》文之「彼」歸諸「使臣」，則其下「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云云，在文意上便顯得牽強。而朱熹視〈采葛〉為淫奔者託言之詩，劉沅以為〈采葛〉一詩詞氣和順，看不出可以定為淫詩的理由。因此，他以為〈采葛〉一詩的詩旨應是賢者被黜於野，周人閔惜之作。〈采葛〉一詩之中，所謂「采葛」、「采蕭」、「采艾」都是小人之事，以那樣的賢者，卻只在做如斯小事，因此令人思念不止，即使一日不見，也如三年不見之久，而《詩》文之中，所謂「彼采葛兮」、「一日

¹³ 朱熹視〈鄘風·桑中〉、〈王風·大車〉與〈鄭風·子衿〉為淫詩，云：「衛俗淫亂，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。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，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。」（《詩集傳》卷三，頁 444）、「淫奔者相命之辭也。……周衰，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，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。」（同上，卷四，頁 468～467）、「此亦淫奔之詩。」（同上，卷四，頁 478），同注 4。

不見，如三月兮」、「彼采蕭兮」、「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」、「彼采艾兮」、「一日不見，如三歲兮。」之「兮」字，均是情有餘蘊之詞，顯示詩人不直言其君棄賢之非，而僅說賢者所事非常而已，流露出無限歎惜，但卻至為溫柔敦厚之意。在實際的詮解中，劉沅釋〈采葛〉即謂：

賢者見黜於野，而其友思之。言其事非所事，以明己眷念之深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77a）

釋〈采葛〉一章：「彼采葛兮，一日不見，如三月兮。」也云：

賦也。彼謂賢者，蓋在朝之士思被黜之賢而諱言之，故曰彼也。葛所以為絺綌，如三月，思念之深，未久而似久也。

（同上，頁 77a）

（二）《詩經恒解》對於朱熹「淫詩」說的駁議

透過前述，劉沅對於先儒詮《詩》不諦之處，都有論議、謾正，而所論議、謾正者，自又以漢、宋《詩經》學的代表：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為多。其中，對於朱熹詮《詩》的論議、謾正，除就《詩》旨上的不諦，提出非議、修正外，對於朱熹所倡提的「淫詩」，劉沅在《詩經恒解》中，也一一加以非議、修正。去《序》詮《詩》及倡提「淫詩」，原是漢宋《詩經》學的二大分野。就去《序》詮《詩》而言，由於朱熹認為《詩序》出於漢儒，其詮《詩》多悖離《詩》文，多所錯謬，（如以史證《詩》、以史說《詩》，例採美刺時君國政、忽略《詩》作本於情性，忽視、不尊重《詩》文，而跳脫蔓衍，恣意衍說，有附會書史、依託名諡，鑿空妄語、坐實人事之弊等），因而主張回歸《詩》文，即《詩》求義，充分尊重由詩文脈絡中所呈顯出來的意涵，而僅將《詩序》視為一種解《詩》觀點。就倡提「淫詩」言，朱熹從去《序》詮《詩》，回歸詩文，含咀《詩》義，及反對《詩序》例以美刺說《詩》、流於附會鑿說的脈絡中，提出「淫詩」；從「詩本性情」而作，而情性有邪有正的觀點，提出「淫詩」，從國風是里巷歌謠，內容多述男女情思，而其作者大都為未能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，得情性之正、欲動情勝的閭巷小人、婦人小夫的認知下，提出淫詩，從孔子對鄭聲的指斥（「放鄭聲，遠佞人。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、「惡紫之奪朱也，惡鄭聲之亂雅樂也，惡利口之覆邦家者。」）、《禮記·樂記》對「鄭衛之音」是「亂世之音」的批評，及「聲詩合一」的觀念上提出淫詩¹⁴。劉沅釋《詩》，在《詩序》的作者，內涵上，亦認為《詩序》詮《詩》，「其詞義純雜不一，大

¹⁴ 有關朱熹的「淫詩」說，可參拙著：朱熹詩經學與詩經漢學傳統異同之研究（臺北：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2004年2月）第七章「淫詩和刺淫」。

抵源於子夏，而後儒增益之；即〈大序〉亦非盡子夏之言也。至《小序》則多失《詩》意，今取其合聖人之義者存之，他不盡錄。」（《詩經恒解·凡例》，頁 1b~2a）因此，在《詩》旨的詮定上，也多有批駁、不取《詩序》，而取朱熹之說者，唯對朱熹所提的「淫詩」說，劉沅一概不從，並多有論議、批評，茲舉例說明如下：

1. 〈邶風·靜女〉

〈邶風·靜女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時也。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三，204）以為是由於衛君無道、夫人無德，因此詩人敘寫貞靜有德之女，希望能讓這位貞靜有德之女，來取代無德的夫人，以輔正國君，使其導之於善¹⁵。朱熹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謂其「全然不似詩意。」（《詩序辨說·靜女》，頁 364）並採歐陽脩之說，視《靜女》為「淫奔期會之詩也。」（《詩集傳》卷二，頁 438）劉沅對於歐陽脩、朱熹之說都提出了非議：

《序》曰：「刺時也。」毛氏曰：「衛君無道，夫人無德。」鄭、孔從之。至歐陽公乃云：「衛俗淫風大行，務以色相誘悅，雖靜女亦然，舉靜女，則他可知。」朱子從之，然永叔之言非也。既為靜女，何以淫亂？淫亂矣而猶曰靜女乎？且彤管為女史所需，以紀成法，傳之自古，今猶遵之，非淫奔之物。張橫渠曰：「後宮西北邃城隅，俟我幽閒念彼姝」亦如古說。呂祖謙謂張子必有所據。詩人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以刺時，其說近似，而解各章詞義牽強。《左傳》曰：「〈靜女〉之三章，取彤管焉。」無淫奔之說，他如孔穎達、王肅、何楷，皆從《古序》。呂大臨曰：「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，後宮，幽閒之地也，女有靜德，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，此有道之君所好也。」亦與張子合，而於本文語氣未明。竊以為衛雖淫亂成俗，然康叔、武公之德，必有賢女，特君不用耳。故作今解，而夫子存此，以見女非無賢，宣公自入於邪，所以居下篇之首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43a~44a）

劉沅以為歐、朱視〈靜女〉為淫詩是錯誤的，他的論點是：《詩》文既言「靜女」（《毛傳》：「靜，貞靜也。女德貞靜而有法度，乃可說也。」，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三，頁 204），則靜女何以會有涉於淫亂之事，其次，「彤管」是女史所需，以紀成法，傳之自古，並不是淫奔之物¹⁶，再

¹⁵ 鄭玄箋釋〈靜女·序〉：「以君及夫人無道德，故陳靜女遺我以彤管之法德，如是可以易之為人君之配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三，頁 204）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靜女·序〉、《鄭箋》之意云：「道德一也，異其文耳。經三章皆是陳靜女之美，欲以易今夫人也，庶輔贊於君，使之有道也。」（同上），同注 3。

¹⁶ 〈靜女〉二章：「靜女其嬈，貽我彤管。」《毛傳》：「既有靜德，又有美色，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，可以配人君也。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，史不記過，其罪殺之。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，女史書

來，張載有謂「後宮西北邃城隅，俟我幽閒念彼姝。」其意與《序》說相合，又呂祖謙、孔穎達、王肅、何楷諸人，皆從《序》說，而呂大臨「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……」云云，也與張載所說相符，據此，劉沅以為衛國雖淫亂成俗，但在康叔、武公的德化之下，一定有賢女居其中，只是衛君並未加以幸進而已。而孔子所以存錄〈靜女〉一詩，也是要來說明衛國並非沒有賢女，只是宣公自己妄為淫邪之事而已，劉沅因謂〈靜女〉一詩是：

衛俗淫亂，莊姜賢而失位。宣公之時，尤必有賢媛見黜者，故詩人咏歎而惜之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43a）

以為是宣公之時，衛國有賢媛而見黜者，詩人遂作〈靜女〉來加以咏嘆，並傳達憐惜之情。

2. 〈鄘風·桑中〉

〈鄘風·桑中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奔也。衛之公室淫亂，男女相奔，至于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，期於幽遠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一，頁 225）以為是譏刺衛國公室淫亂、世族淫奔之詩。朱熹釋〈桑中〉，不以《詩序》「刺奔」之說為然，而以為是「淫奔者所自作」的淫詩，云：

衛俗淫亂，世族在位，相竊妻妾。故此人自言將采唐於沫，而與其所思之人相期會迎送如此也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三，頁 444）

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，《序》之首句以為刺奔，誤矣！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。《樂記》之說已略見本篇矣。而或者以為「刺詩之體，固有鋪陳其事，不加一辭，而閔惜懲創之意，自見於言外者，此類是也，豈必譏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？」此說不然。夫詩之為刺，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，〈清人〉、〈猗嗟〉之屬是已。然嘗試玩之，則其賦之之人，猶在所賦之外，而詞意之間，猶有賓主之分也，豈有將欲刺人之惡，乃反自為彼人之言，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？其不然也明矣。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為惡，其於此等之詩，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，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，亦豈畏我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？以是為刺，不惟無益，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，而反以勸其惡也。或者又曰：「詩三百篇皆雅樂也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」

其日月，援之以環，以進退之。生子月辰，則以金環退之。當御者，以銀環進之，著于左手；既御，著于右手。事無大小，記以成法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二之三，頁 205），同注 3。

桑間濮上之音，鄭衛之樂也，世俗之所用也，雅鄭不同部，其來尚矣。且夫子答顏淵之問，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，豈其刪詩，乃錄淫奔者之詞，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？」亦不然也。雅者，二雅是也；鄭者，〈緇衣〉以下二十一篇是也。衛者，〈邶〉、〈鄘〉、〈衛〉三十九篇是也。〈桑中〉，衛之一篇，〈桑中〉之詩是也。〈二南〉、〈雅〉、〈頌〉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。鄭、衛、桑濮，里巷狹邪之所歌也。……

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64~365）

《樂記》曰：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。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。」按：桑間即此篇，故《小序》亦用《樂記》之語。」

（《詩集傳》卷三，頁 444）

〈桑中〉之詩，放蕩留連，止是淫者相戲之辭，豈有刺人之惡，而反自陷於流蕩之中！

（《朱子語類》卷八十，頁 2746）

……且如「止乎禮義」，果能止禮義否？〈桑中〉之詩，禮義在何處？王（德修）曰：「他要存戒。」曰：「此正文中無戒意，只是直述他淫亂事爾。」（同上，頁 2738）

詩體不同，固有鋪陳其事，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。然必其事之猶可言者，若〈清人〉之詩是也。至於〈桑中〉、〈溱洧〉之篇，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。

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集·讀呂氏詩記桑中篇》卷七十，頁 337¹⁷）

據上文，朱熹所以視〈桑中〉一詩為淫詩，理由蓋如下，其一，朱熹以為《禮記·樂記》中所謂：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也。比於慢矣。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也。其政散，其民流，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¹⁸。」，其中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。」即指《詩經》中的〈鄭〉、〈衛〉二風，而「桑間濮上之音」，即指〈鄘風·桑中〉一詩。其二，朱熹認為〈桑中〉一詩的內容呈顯出「放蕩流連」之情、「止是淫者相戲之辭」，其中並無譏刺教戒的寓意在，而其作者也並非雅人莊士，而僅是淫者的自道之辭，朱熹認為《詩經》之中，確實有純係鋪陳、敘事，不加一辭，而其中即寄寓作者的譏刺之意之詩，如〈鄭風·清人〉、〈齊風·猗嗟〉之類，但

¹⁷ 《朱子語類》條，見〔宋〕黎靖德編，朱傑人、嚴佐之、劉永翔主編《朱子全書》第拾柒冊，〈讀呂氏詩記桑中篇〉，見《朱子全書》第貳拾參冊，同注 4。

¹⁸ 見〔漢〕鄭玄注、〔唐〕孔穎達正義，李學勤主編：《禮記正義》（臺北：台灣古籍出版公司，2001 年 10 月），卷 37，頁 1258。

此類刺詩，倘就詩文加以研析，可以發現在敘述上有主客之分，作者乃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來鋪陳、敘事，而寄寓其譏刺之意，而非如〈桑中〉一詩，作者乃以第一人稱，以我為主體，在自述己身的淫亂之事，豈有人要作一首刺淫之詩，反而是運用自述的方式，使自己成為譏刺的對象？更何況，如〈桑中〉這類淫詩的作者，本即為淫邪之人，「安於為惡」，詩中所敘寫的詩詞，即是這些人平常的慣用語，服口而出，也不會有絲毫的愧恥之意的，如果說〈桑中〉為刺淫之詩，朱熹認為反而更會助長淫奔之人為惡，因此，〈桑中〉一詩即是淫人自述的淫奔之辭，而非作於雅人莊士的刺淫之詩。劉沅詮解〈桑中〉，對於朱熹所說也提出了非議：

詩，樂章也。古人皆以樂論詩，荀況曰：「詩者，中聲所止」，司馬遷曰：「三百篇，夫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於韶武」，漢唐諸儒，祖述其說而不敢易。至朱子援《樂記》「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」，謂「桑間即此詩」，「淫者自作」，「非刺者之詞」，深闢《序》說。呂祖謙曰：「聖人正樂，首放鄭聲，豈有刪詩而反取淫詞，〈桑中〉之詩，刺惡昭彰，所謂『思無邪』也。」《史記》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，鄭康成以為濮水之上，地有桑間，亡國之音，於此出焉，則桑間乃紂樂，非即〈桑中〉詩。馬端臨亦深以朱子之說為非，而條辨甚詳。愚按：夫子刪詩，凡自敘醜行者，皆去之，而存其有關勸懲者，凡所存刺淫之詩，皆旁人作也，然以其詞多託諷，恐人誤解，故示之曰：「思無邪」。若公然自言醜惡，夫子存之而存人勿邪，是何異開門揖盜，而曰毋發我笥哉？至《樂記》謂「桑間濮上之音」，呂說甚明，原不定指此詩，即所謂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」，亦以其音言，非謂詩也，「鄭聲淫」亦然。此章之旨，朱子泥數「我」字，以為自言，不知詩人起四句，明指其事以為刺，末三句述其言，以歎其無恥，將正文劃作二段自明。前三「矣」字，歎其荒職業而肆淫思，末一「矣」字，歎其公然自號於眾。蓋淫亂之風，往往自上倡之，以其逸樂易生奢淫，而相習之久，遂以為常而無復羞愧，貴族之流，覲然如此，是衛之所以淪於狄而子遺無幾也。後世文士，或有工於描寫閨情，以為風雅者，曷不思男女之欲不學而能，何待為之摹其情狀？聖人以禮樂節和民心，惟恐其不中正，後世以風流相尚，致使才學之士毀性滅身，愚魯之流，干名犯義，此詩誤解，亦一誨淫之作也，烏可以勿辨哉！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49b～50b）

朱熹援據《樂記》「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」之語，以為「桑間」即〈桑中〉一詩，劉沅先

引呂祖謙之說：孔子正樂，首在放絕鄭聲，不可能既有刪詩之舉，卻反而收錄〈桑中〉的淫詩，孔子既云「思無邪」，則〈桑中〉即是刺淫之詩。又據鄭玄說解《史記》所載師曠所指濮上之音，以為桑間是紂樂，非〈桑中〉一詩，並指出馬端臨也曾深以朱子之說為非，來點明朱熹以〈桑中〉為淫詩之非。然後再申言自己的論點，並點出朱熹所見之非，劉沅所說，可以歸納三點，其一，《詩經》經孔子刪汰後，凡屬於自敘醜行的淫詩，業皆刪去，留下來的都是有關勸善懲惡的刺淫之作，由於《詩》文詞多託諷，為免後人誤解為淫詩，所以孔子特別標舉「思無邪」，其二，〈樂記〉所謂「桑間濮上之音」，據呂祖謙說，非必指〈桑中〉一詩，另一方面，〈樂記〉又謂「鄭衛之音，亂世之音」，甚至孔子所謂的「鄭聲淫」，都是就音樂來立論，並非指鄭衛之詩，其三，朱熹泥滯〈桑中〉一詩數「我」字，以為是淫者自述之詞，劉沅以為〈桑中〉一詩應作二段看，則自分明，即起首四句（按：即「爰采唐矣，沫之鄉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姜矣。」、「爰采麥矣，沫之北矣。云誰之思？美孟弋矣。」、「爰采葑矣，沫之東矣。云誰之思，美孟庸矣。」）詩人明指直事以為譏刺，而後三句敘述淫奔者之言（按：指「期我乎桑中，要我乎上宮，送我乎淇之上矣。」），以歎其無恥。首四句中的三個「矣」字，是歎淫奔者荒其職業，肆其淫思，而後三句中的一「矣」字，則是歎其公然自號於眾，無復羞恥。劉沅釋〈桑中〉，既不以朱熹「淫奔者自作」，為淫詩之說為然，遂謂〈桑中〉是：

衛俗淫亂，至忘其職業而誇示遇合之緣，詩人刺之，竝述其言，以見其羞惡心亡，出於貴族，為尤可痛也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49b）

以為是衛俗淫亂，至有忘其職業而誇示遇合之緣者，詩人作〈桑中〉一詩來譏刺此一現象，並透過敘寫淫奔者的語言，來呈顯貴族羞惡之心的亡失，以寄寓其傷痛之情。

3. 〈衛風·有狐〉

〈有狐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時也。衛之男女失時，喪其妃耦焉。古者國有凶荒，則殺禮而多昏，會男女之無夫家者，所以育人民也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三，頁288）以為〈有狐〉是刺時之詩。由於衛君不能教導人民隨時殺禮來成婚，致使衛國的男女在年盛之際，不能適時成婚，馴致孤寡無匹，所以詩人作〈有狐〉一詩，來譏刺衛君¹⁹。朱熹不取《詩序》之說，而謂：「比也。狐者，妖媚之獸。綏綏，獨行求匹之貌。……國亂民散，喪其妃耦，有寡

¹⁹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有狐·序〉云：「作〈有狐〉詩者，刺時也。以時君不教民隨時殺禮為昏，至使衛之男女失年盛之時為昏，而喪失其妃耦，不得早為室家，故刺之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三之三，頁288），同注3。

婦見鰥夫而欲嫁之，故託言有狐獨行，而憂其無裳也。」（《詩集傳》卷三，頁 459）以為〈有狐〉是「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」的淫詩。劉沅對於朱熹之說，亦不以為然，云：

〈序〉曰：「刺時」，毛氏曰：「衛之男女失時，喪其配偶」，引《周禮》「荒政殺禮而多昏」，謂衛不能然也。先儒從之，而朱子竟以為「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」，蓋以有狐淫獸取譬，或然耳。然玩其詞旨婉和，不類淫人之作。或謂君子於寒夜，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此，按之詩意似得其實。蓋狐涉在大寒之時，而民乃無衣無服，故君子即所見以起興，觀其纏綿悱惻，見於言表，以為有惻隱之仁，乃近似也。」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68a）

劉沅以為《詩序》「刺時也」、續序「衛之男女失時，喪其耦焉。」並援引《周禮》「荒政殺禮而多昏」之義，來譏刺衛君的不能之說，先儒都遵從之，但朱熹卻視之為「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」的淫詩，劉沅以為就〈有狐〉一詩的詞旨婉和看來，並不是淫人自作的淫詩，而應是「君子於寒夜，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」的悲憫之詩，全詩充滿了君子的惻隱、不忍之心，在實際的詮解中，劉沅亦謂〈有狐〉是：

興也。……狐性疑善聽，冰堅則過，河在淇梁，則凝冰歲寒之時矣，而之子乃無裳獨行，故詩人憂之。（釋〈有狐〉一章，

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68a）

興也。厲，深水可涉處。帶所以束衣。水深處，狐亦遊之，則寒益甚矣。衣薄而有帶，猶可禦寒，無之則貧甚矣。

（釋〈有狐〉二章，同上）

興也。淇側，常在其側。無服，周身之服皆不全也。（釋〈有狐〉三章，同上，頁 68a）

國亂民貧，君子傷之而作。子曰：「於〈有狐〉，見惻隱之仁焉。」

（釋〈有狐〉全詩，同上）

4. 〈鄭風·山有扶蘇〉

〈山有扶蘇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忽也。所美非美然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三，頁 350）以為是譏刺鄭國太子忽之作。由於忽用人失當，「置小人於上位，置君子於下位」；「置

不正之人於上位，置美德之人於下位」，用臣顛倒，因此詩人作〈山有扶蘇〉一詩來譏刺他²⁰。朱熹不以〈序〉說為然，謂：

此下四詩（按：即〈山有扶蘇〉、〈蓀兮〉、〈狡童〉、〈褰裳〉四詩）及〈楊之水〉皆男女戲謔之詞，《序》之者不得其說，而例以為刺忽，殊無情理。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71）

淫女戲其所私者曰：山則有扶蘇矣，隰則有荷華矣，今乃不見子都，而見此狂人，何哉？（《詩集傳》卷四，頁 475）

視〈山有扶蘇〉為「淫詩」、「男女戲謔之詞」，對於《詩序》循例將〈山有扶蘇〉及〈鄭風〉中諸多淫詩定為刺忽之作（按：《詩序》將〈鄭風〉中的〈有女同車〉、〈蓀兮〉、〈狡童〉、〈褰裳〉、〈楊之水〉俱定為刺忽之作），朱熹以為殊無情理。劉沅詮解〈山有扶蘇〉，也不取朱熹「淫詩」說，云：

《序》謂「刺忽」，非也。毛氏所謂「所美非美」，則得詩意。朱子初解，亦從之，而呂祖謙取其說，著之《讀詩記》，朱子亦曾與之，後乃改為淫女戲其所私，祖謙已不及見矣，然儒者多從《序》說。第《毛傳》以「狡童」為斥昭公，大非，鄭康成以為喻昭公所用非人，孔穎達曰箋義為長，然必切昭公言，初未有以見其實也，不如作泛刺小人之詩為得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10a~10b）

指出《山有扶蘇·序》首句「刺忽」之說為非，而其下之文「所美非美然」則是符合詩意。對於《毛傳》以詩文中之「狡童」為指昭公，劉沅指出是「大非」，對於鄭玄釋詩文「山有喬松，隰有游龍。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」以為是比喻昭公所用非人，而孔穎達以箋義較毛傳為長，劉沅以為不必緊扣昭公來立說，因為這樣詮說並不符合事實²¹，他以為詮解〈山有扶蘇〉，

²⁰ 〈山有扶蘇〉首章：「山有扶蘇，隰有荷華。」《毛傳》云：「興也。扶蘇，扶胥，小木也。荷華，扶渠也，其華齒莖。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三，頁 351）《鄭箋》云：「興者，扶胥之木生於山，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。荷華生於隰，喻忽置有美德者於下位。此言其用臣顛倒，失其所也。」（同上）又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詮釋首章之意云：「毛以為山上有扶蘇之木，隰中有荷華之草，木生于山，草生于隰，高下各得其宜，以喻君子在上，小人在下，亦是其宜。今忽置小人于上位，置君子于下位，是山隰之不如也。忽之所愛，皆是小人，我適忽之朝上，觀其君臣，不見有美好之子閑習禮法者，乃唯見狂醜之昭公耳。言臣無賢者，君又狂醜，故以刺之。鄭以高山喻上位，下隰喻下位，言山上有扶蘇之小木，隰中有荷華之茂草，小木之處高山，茂草之生下隰，喻忽置不正之人于上位，置美德之人于下位。言忽用臣顛倒，失其所也。（同上，頁 351~352）

²¹ 《詩序》詮解〈鄭風〉，有不少詩篇皆以為是刺忽之作，如〈遵大路〉、〈有女同車〉、〈山有扶蘇〉、〈蓀兮〉、〈狡童〉等，凡此，朱熹皆有駁辨，而朱熹之觀點，也為劉沅所採用，如《詩經恒解》

不如解作泛刺小人之詩即可，在實際的詮解中，劉沅即謂：

小人在位，詩人刺之而作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10a）

5.〈鄭風·子衿〉

〈子衿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脩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四，頁 366～367）以為〈子衿〉是譏刺學校荒廢之作。由於鄭國衰亂，學校不脩，使得學者四散，或去或留，因此，詩人藉著敘寫留者對於去者的責恨心情，來譏刺學校的荒廢²²。朱熹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云：

疑同上篇（按：指〈風雨〉），蓋其詞意猥薄，施之學校，尤不相似也。

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72）

此亦淫奔之詩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四，頁 478）

仍視〈子衿〉為淫詩。懷疑〈子衿〉一詩的意旨和前篇的〈風雨〉相同，都是抒露了淫女對於淫男的相思之情。而朱熹所以不取《詩序》「刺學校廢也」之說，乃是因為朱熹以為〈子衿〉一詩為淫女所作，其中所表露的文詞，詞意輕薄，不夠莊重，以此輕佻之詞，而謂是學校中所友的想念之詞，顯然非常不類。劉沅對於朱說亦提出非議：

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，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，然明曰：「毀鄉校如何？」子產曰：「何為？」則鄭之學校，其來舊矣。《序》謂「刺學校不修」，自漢及宋元明諸儒，皆從之，而朱子謂為淫奔之作，然〈自（按：應作白）鹿洞賦〉云：「廣青衿之疑問」，仍用《序》說，蓋《詩》義甚明，古說不可廢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16a）

劉沅指出據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所載：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，然明曰：「毀鄉校如何？」

釋〈有女同車〉云：「《序》說『鄭人刺忽不昏於齊』，朱子非之，曰：『忽之辭昏，未為不正，即勢孤援寡，不能自立，亦未有可刺之道』，其說是矣。……考鄭忽平生無他失德，特柔懦不能自立，詩人欲其以齊為援，又此女有德音，非文姜比，而忽不從，故深惜之。……」（卷二，頁 8a～9b）

²²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子衿·序〉云：「鄭國衰亂，不脩學校，學者分散，或去或留，故陳其留者恨責去者之辭，以刺學校之廢也。」（卷四之四，頁 367），同注 3。

子產曰：「何為？……」云云²³可知鄭國之有學校，其來已久，《子衿·序》所謂「刺學校不修」之說，自漢以迄宋元明諸儒皆遵從之，即使朱熹在《詩集傳》中謂〈子衿〉為淫奔之作，但在所作的〈白鹿洞賦〉中仍有取《詩序》之義，所謂「廣青衿之疑問²⁴」，可見〈子衿〉是刺學校不修之義甚明，而古說也不可廢。劉沅因釋〈子衿〉一詩的詩旨為：「學校不修，士玩師失學，賢者憂之而作。」、「夫學校所以育才，尤貴明師，今師賢傲玩，則上之持風教者過矣。」（以上並見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16a）

6. 〈鄭風·溱洧〉

〈溱洧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亂也。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，淫風大行，莫之能救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四，頁376）所謂「刺亂」，即是刺淫。由於鄭國征戰不斷，導致男女相棄，淫風盛行，到了無法遏止的地位。男女的結合本當循正當的禮節，但今鄭國國內淫風盛行，到處都有男女淫佚之事，因此詩人作〈溱洧〉一詩，以述當時的淫風，並寄寓譏刺之意。朱熹釋〈溱洧〉，也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云：

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之辰，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。故其女問於士曰：盍往觀乎。士曰：吾既往矣。女復要之曰：且往觀乎？蓋洧水之外，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。於是士女相與戲謔，且以勺藥相贈而結思情之厚也。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四，頁480～481）

鄭俗淫亂，乃其風聲氣息流傳已久，不為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而後然也。

（《詩序辨說》頁373）

視〈溱洧〉為淫奔者自敘的淫詩。在《詩序辨說》中指出鄭國淫風盛行，是由於風聲氣息，其來已久，並非是由於「兵革不息，男女相棄」有以致之。劉沅詮解〈溱洧〉，也不取朱說，謂：

²³ 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：「鄭人游于鄉校，以論執政。然明謂子產曰：『毀鄉校，何如？』子產曰：『何為？』夫人朝夕退而游焉，以議執政之善否。其所善者，吾則行之，其所惡者，吾則改之。是吾師也，若之何毀之？我聞忠善以損怨，不聞作威以防怨。豈不遽止？然猶防川，大決所犯，傷人必多，吾不克救也。不如小決使道，不如吾聞而藥之也。」……（《左傳正義》，卷四十，頁1301～1302），同注12。

²⁴ 見〔宋〕朱熹：〈白鹿洞賦〉，《朱子全書》第貳拾冊《晦庵先生朱文公全集》卷一，頁220～222，同注3。

鄭俗淫亂，乘上巳祓除之辰，士女冶遊相樂，詩人述其事而刺之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19a）

此詩及衛〈桑中〉篇，《序》謂刺亂，朱子俱改為淫奔者所自作，辨呂祖謙之說，然自南宋以迄元明諸儒，卒多異議，而辨之者亦多詳明，特於本文語氣未暇細繹，茲特就本文自然神理訓之，亦人心中公是之見耳。

（同上，頁 19a~19b）

以為〈溱洧〉是鄭俗淫亂，詩人敘寫其事而譏刺之詩。對於朱熹將〈鄭風·溱洧〉、〈鄘風·桑中〉二詩，俱更易《詩序》「刺亂」、「刺奔」之說為淫奔者自作之詩，並辨駁呂祖謙之說，劉沅以為自南宋以迄元明諸儒，對於朱熹所執持的淫詩，也多有詳明的辨議，唯就〈溱洧〉一詩的本文語氣未詳細繹。因此劉沅即就〈溱洧〉一詩的本文自然神理，加以訓解²⁵。

按：朱熹倡提淫詩，劉沅皆不以為然，其觀點除見諸〈鄘風·桑中〉一詩的〈附解〉之外，在〈鄭風〉的卷末，劉沅也有再有申論：

朱子因孔子「放鄭聲」，遂改竄《序》說，半屬淫詩。前人云：「放鄭聲者，主聲不主詩。子夏對魏文侯，謂宋、鄭、衛、齊四音，皆淫於色而善於德，然宋今無詩。」或曰：「凡樂非雅者，皆謂之鄭聲，故《漢志》云：『鄭聲施於朝廷』」或曰：「得聲而得詩者三百篇，則係之風、雅、頌，得詩而不得聲者，則置之，謂之逸詩」或曰：「刺奔、刺亂，國史所題，應是當時情事，所以王應麟、方回輩，以為前輩未了公案」。然聖人編詩，原以正樂，三百篇詩出自作者，本不盡關大義，自夫子刪之而大義昭彰，即不啻夫子之詩矣。凡風詩淫亂之詩，皆非其人自作，愚於〈桑中〉詩已言之，「鄭聲淫」，謂其樂之聲謂後世流失所致者，非謂詩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19b~20a）

《折衷》曰：「鄭詩二十一篇，〈女曰雞鳴〉、〈有女同車〉、〈出其東門〉，貞而好德，有〈二南〉之遺風，〈溱洧〉則刺亂也，餘十七篇，皆有為而作，非男女之私，何淫之有？」誠哉足破群疑矣！又按：三百篇聲詩，東漢末雅樂郎杜夔已老，止記習〈鹿鳴〉、〈騶虞〉、〈伐檀〉、〈文王〉四篇，餘聲不傳。太和末，又失其三，至晉室而〈鹿鳴〉又無傳，是詩存而聲失已久。然苟得《詩》之解，即吟咏其詞，反復流連，自可以理性情

²⁵ 劉沅釋〈溱洧〉首章云：「言二水方盛之時，男女共採蘭以祓除，且相約觀於洧水之外，謂其地寬大且樂，於是相與戲謔，以勺藥為贈，蓋相習成風而不知其非也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19a），釋二章云：「張彩曰：『曰士曰女，皆旁觀者之詞，直書其事而醜態自見也。』」（同上）

而養中和，夫子曰：「《詩》可以興、觀、群、怨」、「女為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」，何嘗盡以聲樂為訓也。第鄭衛之音，則當以聲論，而不當以詞論。夫子所刪之詩，凡自敘淫行者，皆不錄之，乃可垂教也。若存其淫詩，而又教人，「思無邪」，是何異開門揖盜，而令其毋發巾笥乎？（同上，頁 20a）

據此文，劉沅先援引前儒「放鄭聲者，主聲不主詩」、「凡樂非雅者，皆謂之鄭聲」、「得聲而得詩者三百篇，則係之風、雅、頌，得詩而不得聲者，則置之，謂之逸詩」、「刺奔、刺亂，國史所題，應是當時情事」云云諸說，以淫詩、刺淫的爭論，確如王應麟、方回等人所說的「前輩未了公案」。唯劉沅以為《詩經》三百篇，經孔子刪汰整理後，皆具有垂教的大義，凡屬淫亂之詩，俱經孔子刪汰，因此，收錄在《詩經》中的國風諸詩，都非淫人所自作，由旁人所作，藉以刺淫，而所謂「鄭聲淫」，也是指樂的聲調流失所致，並不是指〈鄭風〉諸詩，否則孔子刪詩，既錄淫詩，又要教人「思無邪」，這與開門揖盜，又令其人毋發巾笥何異呢？另一方面，劉沅也援引《欽定詩義折衷》的論點：〈鄭風〉二十一篇，〈女曰雞鳴〉、〈有女同車〉、〈出其東門〉三詩是「貞而好德，有〈二南〉之遺風」，〈溱洧〉則是刺亂；至於其他十七篇詩，也都是有所為而作，並非是述寫男女之私，何來淫詩之說，劉沅以為此說，足以破群疑。朱熹據孔子所謂「鄭聲淫」、「惡鄭聲之亂雅樂」、及《禮記·樂記》對「鄭衛之音」是「亂世之音」的批評；且以《禮記·樂記》「桑間濮上之音，亡國之音。」逕指是〈鄭風·桑中〉等理由，遂更易《詩序》刺淫、刺亂之說為淫人自作的淫詩，劉沅則執持《詩》經孔子刪汰整理後，其中已無淫詩，《詩經》中無淫詩，而只有刺淫之詩，如此，才能彰顯孔子藉《詩》垂教之意；另一方面，所謂「鄭聲淫」、「鄭衛之音」也是就聲調而言，並非指〈鄭風〉、〈衛風〉，所持觀點既異，劉沅對於朱熹所倡提的淫詩之說，遂一概不取²⁶。

四、《詩經恒解》的詮《詩》態度

²⁶ 關於劉沅執持《詩》經孔子刪汰整理後，已無淫詩，如此才能彰顯聖人藉《詩》垂教之意，在〈曹風〉卷末也傳達了同樣的觀點：「周衰，王政不行，道湮俗敝，變風斯作。然其變也，不自知其變也。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或直敘其情事，而是非自陳；或賢者之憂傷而興哀悉具，聖人錄之，使人知變故所由生，而早慎其始。列國之風，不盡於此，而此已得其大全，故止於此矣。若其繁〈匪風〉、〈下泉〉於終，尤顯然見救變之意。故《詩》雖變，而自子刪存之，則皆正矣。若如舊說，半屬淫亂之詞，而繁而不殺，聖人奚取焉？學者當以夫子之意說《詩》，而不必拘泥先儒之說可也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79a）

《詩經恒解》的特點，展現在劉沅對於先儒釋《詩》的論議與修正，已如前述，而就《詩經恒解》的詮《詩》態度而言，則展現了一種無所偏黨，不拘漢宋，而以切合《詩》義、聖人刪《詩》垂教之義為要的蘄向，因為無所偏黨，不拘漢宋，因此，劉沅在釋《詩》上，固有對於前儒、《詩序》、朱熹詮《詩》不諱之處，多所指正、非議，然而，凡《詩序》、朱熹詮《詩》諱當之處，劉沅也往往不吝肯定，並進而承用，展現了所謂「盡除門戶之見，不苟異同，務求當於經義」的治經態度，茲就《詩經恒解》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詮《詩》的肯定、承用處，舉例說明，以見其詮《詩》態度。

(一)對於《詩序》的承用與肯定

1. 〈王風·中谷有蓷〉

〈中谷有蓷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閔周也。夫婦日以衰薄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爾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一，頁305）以為是平王之時夫婦之恩日以衰薄，至逢遇凶年饑饉，遂至於相離棄，由此證明其時風俗衰敗，所以詩人作此詩來表達憫惜之情²⁷。劉沅對於《詩序》之說執持肯定的態度，謂：

《序》云「閔周」是也。蓋政散民流，賢者覩其仳離而深歎惜，舉女則民不待言。其曰「遇人艱難」、「遇人不淑」，若謂其夫，若謂他人，蓋詩人諱言在上，忠厚之詞也。「啜泣何及」，又言不早為計，至於流離，若責之而悼逾深矣。舊說作婦怨夫之詞，夫凶年流離，其夫亦出於無奈，責之則為傷厚，且於詞義較緩矣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75b）

認為《詩序》「閔周」之說為是。由於政散民流，賢者看到夫婦仳離，因深致歎惜之意，舉婦人之遭受離棄，則其他人民的遭遇可知。在實際詮解〈中谷有蓷〉一詩中，劉沅也承用《詩序》之說，謂：「凶年饑饉，室家相棄，而詩人歎之，蓋旁觀之詞，所以致其責備有位之思也。」

（同上）

2. 〈王風·丘中有麻〉

²⁷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中谷有蓷·序〉云：「作〈中谷有蓷〉詩者，言閔周也。平王之時，民人夫婦之恩日日益以衰薄，雖薄未至棄絕，遭遇凶年饑饉，遂至室家相離棄耳。夫婦之重逢，遇凶年薄而相棄，是其風俗衰敗，故作此詩以閔之。」（卷四之一，頁305～306）同注3。

〈丘中有麻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思賢也。莊王不明，賢人放逐，國人思之，而作是詩也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一，頁317）以〈丘中有麻〉是思賢之詩。由於莊王昏昧，闇於知人，使得賢人遭受放逐，國人對這位賢人思念不已，遂作〈丘中有麻〉一詩來誌之。劉沅詮解〈丘中有麻〉，對於《詩序》之說也持肯定的態度，謂：

《序》以為思賢，諸家皆從之，獨朱子謂其語意不莊，然詳味之，未有以見其不莊也。先儒議之者多，當從《序》說。獨《毛傳》以「子國」、「子嗟」為父子則泥耳，謂「留」為姓亦非。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79a）

賢者自食其力，國人思之而作。（同上）

劉沅以為，《詩序》「思賢」之說，諸家都遵從之，只有朱子以〈丘中有麻〉一詩的語意不莊，因更易《詩序》「思賢」之說，而謂其是「淫奔者之詞」。唯劉沅以為詳味詩文，其中實看不出有語意不莊之意，因此，他以為當從《詩序》的詮說²⁸，在實際的詮解中，劉沅即承用《詩序》之說，謂：「賢者自食其力，國人思之而作。」（同上）

3. 〈鄭風·子衿〉

〈子衿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學校廢也。亂世則學校不脩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四，頁366～367）以為是譏刺學校荒廢之作。由於鄭國衰亂，學校不脩，使得學者四散，或去或留，因此詩人藉著敘寫留者對於去者的恨責心情，來譏刺學校的荒廢。劉沅詮解〈子衿〉，也以《詩序》之說為然，謂：

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，鄭人游鄉校，以論執政，然明曰：「毀鄉校，如何？」子產曰：「何為？」則鄭之學校其來舊矣。《序》謂刺學校不修，自漢及唐宋元明諸儒皆從之，而朱子謂為淫奔之作，然〈自（按：應作白）鹿洞賦〉云：「廣青衿之疑問」，仍用《序》說，蓋詩義甚明，古說不可廢也。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16a）

²⁸ 劉沅釋〈王風·丘中有麻〉從《詩序》「思賢」之說，此意在〈王風〉卷末，也有說明：「周之衰也，與他國異。幽王被弑，賴諸侯以復安。使平王能修明王制，任用賢侯，列國猶未敢貳也。乃輕棄故都，甘於庸弱，諸侯遂不復秉王令，然其遺風善政，猶有存者，故〈王風〉十篇，多賢人君子閔時之詞，而夫子敘〈黍離〉於篇首，見東遷之所以衰，殿〈丘中〉於篇末，見王室之猶可為。季札曰：『美哉！思而不懼，其周之東乎！』思，憂思，不懼，先王之遺澤，猶有存者，可不懼也。舊說諸多誤解，竝夫子錄《詩》之意不明，學者當就本文涵泳，求其自然之義，則得之矣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79a～79b）

劉沅指出據《左傳》襄公三十一年「鄭人游鄉校，以論執政」云云的記載，可見鄭國之有學校，淵源甚古。《詩序》以〈子衿〉為刺學校不修之詩，自漢以迄唐宋元明諸儒都遵從《序》說，只有朱子以〈子衿〉為淫奔之詩，但朱子在所作的〈白鹿洞賦〉中有「廣青衿之疑問」一句，仍沿用《詩序》之義，可見詩義甚明，而《詩序》之說不可廢。在實際的詮解中，劉沅即承用《序》說，謂：

學校不修，士玩師失學，賢者憂之而作。夫學校所以育才，而育才尤貴明師，今師賢而弟傲玩，則上之持風教者過矣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16a）

4. 〈陳風·墓門〉

〈墓門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陳佗也。陳佗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，惡加於萬民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七之一，頁524）以為是譏刺陳佗之詩。由於陳佗沒有良師的訓導，以至於弑君而自立，為萬民所厭惡，因此，詩人作〈墓門〉一詩來譏刺他，並告戒他應去除恶師²⁹。劉沅對於《詩序》之說，也以為持之有故，謂：

《序》，「刺陳佗也。」毛氏申之曰：「無良師傅，以至於不義。」朱子初從其說，後定《集傳》，不以為然。陳佗事見《春秋》國史所傳，《序》固不為無因，且佗以宗族弑君，比以墓門、鴉、棘，語義親切。國人皆知而不敢言，佗之凶惡，公之閭蔽，均可概見。斧斯望其斷，昔然警其覺，不顧冀其聽，顛倒惕其禍，通首語意皆有著落，特不必添出師傅一層耳。故《折衷》亦從《序》說。又《楚辭·天門》：「何繁鳥萃棘，負子肆情？」王逸註云：「解居父聘矣，過陳之墓門，見婦人負其子，欲與之淫泆，婦人引詩刺之曰：『墓門有棘，有鴉萃止。』」《列女傳》又曰：「陳辯女，陳國採桑之女也，為歌曰：『墓門有棘，墓門有梅』」，其說更異。或又謂孔寧、儀行父從君淫亂，泄冶刺之而作，合觀四說，益知《序》之善矣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66a～66b）

²⁹ 鄭玄箋釋〈墓門·序〉，云：「不義者，謂弑君而自立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七之一，頁524）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墓門·序〉云：「陳佗身行不義，惡加萬民，……由其師傅不良，故至於此。既立為君，此師傅猶在，陳佗仍用其言，必將至誅絕。故作此詩以刺佗，欲其去惡傳，而就良師也。」（同上），同注3。

劉沅指出朱子最初詮《詩》也遵從《詩》說，後作《詩集傳》定本，遂不以《序》說為然³⁰，但陳佗殺太子免自立，致陳國大亂，國人離散一事，確實見載於《春秋》一書³¹，那麼《詩序》所說，固不為無因。況且陳佗以宗族的身分（按：陳佗為桓公之庶弟）弑太子免而自立，以墓門、鴉、棘來比擬他，語義親切。而國人皆知陳佗之惡，卻不敢言，那麼陳佗的凶惡、桓公的闇蔽，都可以概見。加上《詩》文「墓門有棘，斧以斯之。」表露桓公能儘早斷止陳佗之惡，「國人不知，知而不已，誰昔然矣」是要桓公有所警覺，「歌以訊之，訊序不顧」是希望桓公能明聽，而「訊予不顧，顛倒思予。」是希望能替桓公免除太子遭弑、陳國大亂之禍，整首詩文句句皆有竟涵。另一方面，王逸註《楚辭·天問》，有解居父聘吳，過陳之墓門，欲與負其子的婦人有淫泆之行，婦人援引，「墓門有棘，有鴉卒止。」二句詩，來加以譏刺³²，《列女傳》則謂陳國採桑女曾歌「墓門有棘，墓門有梅」，而還有人以為〈墓門〉是泄冶所作，用來譏刺孔寧、儀行父從陳靈公與夏姬淫亂之詩，劉沅以為上述四說合而觀之，則更知《詩序》「刺陳佗」說之善。劉沅既以《序》說為善，在實際的詮《詩》中，亦謂：「陳佗將為亂，國人知之而莫敢言，詩人以此訊陳桓公，其後佗卒弑太子免而伐之。」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65b）

（二）對於朱熹詮《詩》的承用與肯定

1. 〈王風·葛藟〉

〈葛藟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王族刺平王也。周室道衰，棄其九族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一，頁 310）以為是譏刺平王之詩。由於平王「寡於恩施」，「遠棄族親」，因此族人作〈葛藟〉一詩來譏刺他³³。朱熹詮解〈葛藟〉，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謂：

³⁰ 朱熹初解〈墓門〉，從《詩序》之說，見〔宋〕呂祖謙：《呂氏家塾讀詩記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，1983年）卷十三，頁 8b～9a 所引朱氏曰：「陳佗，文公子，桓公鮑之弟也。桓公疾病，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，桓公卒而佗立。明年，為蔡人所殺。此詩刺陳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為佗置良師傅，以至於此也。」

³¹ 《春秋》桓公五年，「春，正月，甲戌，己丑，陳侯鮑卒。」（《左傳正義》卷六，頁 186～187）《左傳》云：「『五年，春，正月，甲戌，己丑，陳侯鮑卒』。再赴也。於是陳亂，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。公疾病而亂作，國人分散，故再赴。」（同上，頁 189），同注 12。

³² 《楚辭·天問》：「何繁鳥萃棘，負子肆情？」王逸注：「言解居父聘吳，過陳之墓門，見婦人負其子，欲與之淫泆，肆其情欲，婦人則引《詩》刺之曰：『墓門有棘，有鴉卒止。』故曰繁鳥萃棘也，言墓門有棘，雖無人，棘上猶有鴉，汝獨不愧也。」見〔宋〕洪興祖：《楚辭補注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81年3月），卷三，頁 180～181。

³³ 〈王風·葛藟〉首章：「緜緜葛藟，在河之滸。終遠兄弟，謂他人父。」鄭《箋》云：「兄弟，猶言族

《序》說未有據，詩意亦不類，說已見本篇。

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69）

以為《詩序》之說沒有根據，且與詩意也不相符合，朱熹因捨《詩序》而謂：

世衰民散，有去其鄉里家族，而流離失所者，作此詩以自歎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四，頁 466）

以為〈葛藟〉是世衰民散，有離開鄉里家族・流離失所的人所作以自悲嘆的詩。劉沅對於朱熹之說即以為然，謂：

《詩序》謂「刺平王」，然王族被棄，亦不至謂他人父母。且周室眾建親親，王畿之內，皆有采地，王室之衰，特以諸侯強大，無棄其九族之事，故從朱子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77a）

以為周室眾建親親，王畿之內，皆有采地，並無棄其九族之事，且王族即使遭棄，也無「謂他人父」、「謂他人母」之理。在實際詮解〈葛藟〉一詩中，劉沅即承用朱熹之說，謂：「時有遭亂去鄉，流離失所者，作此詩以自歎。」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一，頁 77a）

2. 〈齊風・載驅〉

〈載驅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齊人刺襄公也。無禮義故，盛其車服，疾驅於通道大都，與文姜淫，播其惡於萬民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）卷五之二，頁 411~412）以為是齊人譏刺襄公之詩。由於襄公身無禮義，盛飾所乘之車、所穿之衣，疾行驅馳於通達的大道、廣大的都城，而欲與其妹之姜淫通，公然播揚其惡，使萬民皆知，毫無慚恥之心，因此齊人就作〈載驅〉一詩來譏刺他。朱熹詮解〈載驅〉，不取《序》說，而以為是譏刺文姜之詩：

此亦刺文姜之詩。

（《詩序辨說》頁 374）

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於襄公也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五，頁 489）

劉沅詮解〈載驅〉，亦以朱熹之說為然：

《序》：「齊人刺襄公」，朱子以為刺文姜，是也。蓋文姜自桓公薨，莊公元年，夫人孫

親也。王寡於恩施，今已遠棄族親矣，是我謂他人為己父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四之一，頁 311），同注 3。

於齊，二年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，四年，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，五年，夫人姜氏如齊師，七年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，又會齊侯於穀，《春秋》所書，彰彰其肆行無恥，誠非人類，故作此詩刺之。或謂齊侯納朔抗王師，夫人姜氏犒齊師，詩人以此刺之，則專指姜氏如齊師而言，然玩詩意，未有專指，蓋以其屢至齊而作也。夫士之淫惡，其可誅固多，而婦女果貞，亦曷敢犯，此詩所以特刺文姜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28a~28b）

劉沅指出文姜自桓公薨後，屢屢與襄公淫通，據《春秋》所載，即有莊公元年「三月，夫人孫于齊」，二年「冬，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」，四年「春王二月，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丘」，五年「夏，夫人姜氏如齊師」，七年「春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」，「冬，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」³⁴，可見文姜的肆行無恥，因此詩人乃作〈載驅〉一詩來譏刺她。在實際詮解〈載驅〉一詩中，劉沅亦承用朱熹之說，謂：「文姜屢會齊侯，齊人刺之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28a）

3. 〈唐風·蟋蟀〉

〈蟋蟀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晉僖公也。儉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也。此晉也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，憂深思遠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六之一，頁 442）以為是譏刺晉僖公的詩。由於僖公太過節儉，不合禮度，因此詩人作了〈蟋蟀〉一詩來表達憫傷之情，希望僖公在歲暮閒暇之時，能夠依禮來自我娛樂。朱熹詮解〈蟋蟀〉，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謂：

河東地瘠民貧，風俗勤儉，乃其風土氣息，有以使之，至今猶然，則在三代之時可知矣。《序》所謂儉不中禮，固當有之，但所謂刺僖公者，蓋特以諡得之，而所謂欲其及時以禮自娛樂者，又與詩意正相反耳。況古今風俗之變，常必由儉以入奢，而其變之漸，又必由上以及下。今謂君之儉反過於初，而民之俗猶知用禮，則尤恐其無是理也。獨其憂深思遠，有堯之遺風者為得之。然其所以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者，又初不為此也。

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75~376）

指出《詩序》「刺晉僖公」之說，純粹是依據僖公的諡號所作的附會，其次，《詩序》所謂詩人希望僖公能夠即時以禮來自我娛樂，此說也恰好和詩意相反。另外，依《序》說，僖公節

³⁴ 見《春秋左傳正義》卷八，頁 246、252、255、258、262、264，同注 12。

儉，較建國初始為烈，而人民反知用禮，勸他應據禮自娛，朱熹以為此說有違常理。《詩序》詮《詩》既不諦，朱熹因捨《詩序》而謂：

唐俗勤儉，故其民間終歲勞苦，不敢少休。及其歲晚務閒之時，乃敢相與燕飲為樂。而言今蟋蟀在堂，而歲忽已晚矣，當此之時不為樂，則日月將舍我而去矣。然其憂深而思遠也。故方燕樂而又遽相戒曰：今雖不可以不為樂，然不已過於樂乎？蓋亦顧念此職之所居者，使其雖好樂而無荒，若彼良士之長慮卻顧焉，則可以不至於危亡也。蓋其民俗之厚，而前聖遺風之遠如此。（《詩集傳》卷六，頁497）

視〈蟋蟀〉是表露唐俗勤儉，人民終歲勞苦而不敢稍事休息之詩。當歲晚務閒的時候，才敢稍稍相互燕飲為樂，但方將飲樂，卻也即刻彼此告知不能過度享樂，顯示出唐俗勤儉的民風。劉沅詮解〈蟋蟀〉，對於朱熹駁《序》之說，也深以為然：

《序》「刺晉僖公」，申之曰：「儉不中禮，作是詩以閔之」，朱子不從，其見卓矣！愚謂聖人於變風之首，每錄其賢者，以見國之所以造，康叔虞之政教不可考，而其民樂而不荒如此，季札曰：「深思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」故說者皆以為堯之遺澤遠也，而非叔虞有以繼而存之，亦不至此。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36b～37a）

劉沅以為朱熹不從〈蟋蟀·序〉之說，深具卓見。他指出孔子每於變風之首，選錄賢者之詩，以見國家肇建之基，〈蟋蟀〉一詩呈顯民樂而不荒的風俗，季札評論唐風謂：「深思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？」都說明了唐堯的遺澤深遠及叔虞的善於繼存善道。劉沅既深以朱熹之說為然，在實際的詮《詩》中，即從朱熹之說，云：「唐俗勤儉，其民歲晚燕樂而作此詩以相戒，蓋帝堯之遺風遠也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36b）

4. 〈魏風·十畝之間〉

〈十畝之間〉一詩，《詩序》謂：「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民無所居焉。」（《毛詩正義》卷五之三，頁431）以為是刺時之詩。由於魏國土地狹隘，一夫僅分有十畝之地，耕地不足，導致人民無法透過耕墾來維持生活，因此，詩人作〈十畝之間〉一詩，來譏刺這樣的時局³⁵。朱熹詮解〈十畝之間〉，也不以《序》說為然，謂：

³⁵ 《毛詩正義》疏釋〈十畝之間·序〉「刺時也。言其國削小，民無所居焉。」云：「經二章，皆言十畝一夫之分，不能百畝，是為削小。無所居，謂土田陬隘，不足耕墾以居生，非謂無居宅也。」（卷五之三，頁431），同注3。

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仕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，故其詞如此。

（《詩集傳》卷五，頁 493）

國削則其民隨之，《序》文殊無情理，其說已見本篇矣。（《詩序辨說》，頁 375）

指出《詩序》之說「殊無情理」，而以〈十畝之閒〉是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在朝為官，而想和其友歸於農圃之詩。劉沅詮說〈十畝之閒〉，也以朱熹之說為然：

《序》及毛、鄭解說牽強，朱子曰：「政亂國亡，賢者不樂仕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」，是矣。第君子出處以義，難進易退，非忘君國也。必可以行吾之道，有益君民而後仕，否則萬鍾何加焉。此人苟未早知時不可為，至此而後思農圃之樂，則恐其無事，藉祿養以為榮，有事先全身而遠害，烏得為賢？且世固有先熱中而後歸田者矣，其始以名位為必可得，及所求不遂，日暮途窮，乃返而息影，核其初終，竝無為國為民之實念，而論者亦曰急流勇退，知幾而作也。毋亦與於不忠不孝之大者乎？故此乃有志濟時，而小人在位，不得自展，作此詩而遂歸隱也。不然，第云思之而已，其猶有戀棧之私乎？夫子錄之，以明魏之不能用賢，所以亡也。

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33a~34b）

劉沅指出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《鄭箋》的解說都牽強，對於朱熹「政亂國危，賢者不樂仕於其朝，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」的詮說，則執持肯定的態度。唯劉沅以為〈十畝之閒〉一詩的詩旨，應是賢者有志濟時，但小人在位，無以自展，因此作此詩以明志，其後並歸隱農圃。只有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賢者才得以稱賢，如若不然，詩人並未早知時不可為，一直到政亂國危，才想到歸隱之樂，如此，無事藉祿養以為榮，有事，則全身遠害而已，並不能稱作賢者，因此，劉沅詮解〈十畝之閒〉即謂：「賢者不容於朝，思歸隱而作。」（《詩經恒解》卷二，頁 33a）在朱熹詮說的基礎上，略作修正。

五、結語

清初的《詩經》學，既有雜糅漢宋，斟酌於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之間者，也有以朱子為宗，力攻《詩序》者，或以朱子《詩集傳》為主，而兼採眾說者，當然更有宗法漢學，依《序》詮《詩》，攻駁朱熹《詩經》學者，自陳啟源撰《毛詩稽古編》開其端，《詩義折中》「分章多

準康成，徵事率從《小序》」承其緒，而後惠棟撰《毛詩古義》、戴震撰《毛詩補傳》、《毛鄭詩考正》、《杲溪詩經補注》、段玉裁撰《詩經小學》、《毛詩故訓傳定本》、胡承珙撰《毛詩後箋》、馬瑞辰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、陳奐撰《詩毛氏傳疏》，先後繼起，由字詞、音韻、訓詁、名物以通經義；依《序》詮《詩》，宗法漢學的乾嘉《詩經》學遂蔚成大宗。在上述乾嘉詮《詩》的學者之中，除戴震、馬瑞辰尚能擇善而從，不拘漢宋的門戶外，著述等身，人稱「川西夫子」的四川大儒劉沅撰有《詩經恒解》六卷，更呈顯了此種不拘漢宋，唯以符合經典原義作為取捨、論斷標準的釋《詩》斬向。就《詩經恒解》全書看來，有對歷代詮《詩》專著，如《詩序》、《毛傳》、鄭《箋》、孔《疏》、朱《傳》等的論議評駁，而自出己意者，也有專對《詩序》詮《詩》、朱熹詮《詩》不愜之處，加以非議者，除此之外，在非議評駁前儒傳注外，對於《詩序》、朱熹詮《詩》諦當之處，也頗能肯定與承用，綜合言之，劉沅撰作《詩經恒解》乃展現了不拘漢宋、破除門戶之見，而一以符合《詩》義、聖人刪《詩》垂教之義為依歸的詮《詩》斬向，此種以符合《詩》義、聖人刪《詩》垂教之義的詮《詩》原則，實際上也即是一種回歸原典的釋《詩》方式。乾嘉之際，學者側重在惠棟的《毛詩古義》、戴震的《毛詩補傳》、《毛鄭詩考正》、胡承珙的《毛詩後箋》、馬瑞辰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及陳奐的《詩毛氏傳疏》等著作上，但對於撰作於嘉慶十年，比胡、馬、陳三家的年代都還早的劉沅的《詩經恒解》³⁶，則殊少致意。透過初步的研探，一方面，吾人印證了《清史稿·國史館本傳》對劉沅的評論：「其解經盡除門戶之見，不苟異同，務求當於經義，乃至語氣抑揚之間，必悉脗合」，另一方面，也讓我們了解到處在漢幟興盛、漢學牢籠的氛圍下，仍有學者斟酌論議於《詩序》、朱《傳》等歷代詮《詩》專著之中，而以切合《詩》義為要，並不受到宗法漢學的影響，也並無拘守門戶，偏黨漢學的偏見。這對於我們在理解清代的詮《詩》面貌上，或許也能有所助益。

³⁶ 據簡澤峰的研究，胡承珙的《毛詩經箋》撰於道光四年（1824）卸職台灣兵備道，回歸鄉里之後，歷時九年，經過四次修改後才寫定，唯未完書，寫至〈魯頌·泮水〉一章，即病發身亡，遺囑陳奐續成，而馬瑞辰的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，據劉邦治的研究，成書於道光十五年（1835），至於陳奐的《詩毛氏傳疏》，據林師慶彰之說，大概撰於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以後，而成書於道光二十年（1840），可見胡、馬、陳三家的著作，其成書皆晚於劉沅的《詩經恒解》。簡澤峰之說，見所撰《胡承珙毛詩後箋析論》，頁14～16，劉邦治之說，見《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研究》，頁1～4，林師之說，見《清代經學研究論集·陳奐詩毛氏傳疏的訓釋方法》，頁376～378，同注2。

